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去殖民的文化研究

De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doi:10.29816/TARQSS.199601.0002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1), 1996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21), 1996

作者/Author：陳光興(Kuan-Hsing Chen)

頁數/Page：73-13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816/TARQSS.199601.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十一期 1996年1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21, January, 1996.

去殖民的文化研究

陳光興

De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by
Kuan-hsing Chen

關鍵詞：去殖民、文化想像、批判性混合、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文明主義、
小主體

Keywords: decolonization, cultural imaginary, critical syncretism, geo-coloni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ivilizationalism, little subjectivities

* 本文由國科會 1994-5 國科會卅二屆研究進修報告改寫而成，除感謝國科會外，李丁讚、趙剛、鄭鴻生、丘延亮、丁乃非提供的修改意見一併感謝。

收稿日期：1995 年 9 月 4 日；通過日期：1995 年 11 月 10 日。

Received: September 4, 1995; in revised form: November 10, 1995.



摘 要

本文將文化研究再定位為全球性去殖民運動的一部份。以去殖民為核心的問題意識，本文嘗試提出「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的分析架構；透過接合歷史唯物論、基進地理學及第三世界殖民論述三個理論傳統，指出文化研究的實踐在於揭露殖民認同關係裡所形塑出來的文化想像，制約了被殖民主體慾望流動的方向，並提出「批判性混合」的策略性概念，透過參考作標及互動對象的多重移轉，為去殖民運動尋找更具解放性地主體性建構的認同對象。

Abstract

Repositioning cultural studies as part of the global decolonization move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 more viable analytical framework, geo-coloni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of three theoretical traditions—historical materialism, radical geography, third world colonial discours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ritical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 is to expose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imaginary as a result of colonial identification, which in turn shapes the psychic flow of desire of the colonized subject; it proposes a “critical syncretism” as a strategy and an ethics for reconstituting and multiplying axes and objects of identification in forming more liberating subjectivity.



直到能夠說出獨立運動的主體會是誰，是以誰之名來進行文化去殖民，否則「獨立」與「去殖民」是不可能完成的……

文化問題不可能在權力問題之外來討論……

沒有別人就沒有自己，更沒有自我的認可……

認同的問題經常是在建構未來中解釋過去……

——Hall (1995)

1. 問題意識

這篇文章嘗試提出一個初步的分析性架構，暫且稱為「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geo-coloni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它的提出來自於以下幾個脈絡及關切，企圖面對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1. 本文是〈帝國之眼〉一文的延伸¹。該文對「南進論述」的分析，在結論中提及「去殖民的全面性反思根本沒有運轉，才會承續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P. 211)。該文發表後，文化想像中的去殖民問題成為我思考的焦點：為什麼文化上的去殖民沒有全面性的展開？其他地區，特別是二次戰後出現在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是不是也面臨著類似的危機？是否獨立建國的政權移轉將能量都吸入資源豐富的政經場域之中？本土文化運動的文化切面也因此以服務於建國的迫切性，無法展開去殖民更深層的反思？去殖民的意義難道僅止於獨立建國？去殖民 (decolonization) 難道只是「抵殖民」或是「反殖民」(anti-colonial)？而在「抵／反」的過程中繼續切面複製其所對立面所架構出的限制，因此在轉化中承續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簡單的說，去殖民的意涵及策略是本文的核心關切，根本的出發點是在理論層次上思索要如何面對台灣文化想像中殖民主義所長期形塑的反動、保守因子。在文章的書寫中，讀者會發現在不同的脈絡中，「去殖民」呈現了不同的意義；在結論中，我將集中地討論它的多重意涵。

1. 參見陳光興 (1994)

2. 之所以會提出「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主要是在「學術」上的關切：文化研究的基本認識論—歷史唯物論—在面對「國際化」的過程中必須極為敏銳地調整其空間（地理）屬性；「地理空間」的重要性不僅在將歷史唯物論去中心化使得理論論述更為「謙卑」，更是強調「在地歷史」中的特定性（specificities）是如何與殖民力量辯證過程中，一方面改變了其內在型構，一方面被接合到全球資本結構裏，也就是殖民史中介了在地歷史與全球史。在這樣的前提下，「現代性」（modernity）的問題無法與殖民主義分開來解釋，現代化則是從殖民向新殖民結構性轉換中反應性（reactive）的產物。全球資本主義透過國族—國家的中介企圖將多元地理歷史空間統攝在單一丈量的體系之中。因此，「後殖民論述」的形成絕對不是在宣告後殖民時期的來臨，而是在突顯殖民主義在歷史中所深植的力量及其不斷的深化與轉進，也只有透過去殖民的不斷反思才能挖掘走向後殖民的途徑與策略。簡單的說，「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嘗試回答在台灣這樣的地方「文化研究」究竟是什麼？要如何藉用它來破解資本—帝國—殖民主義所長期塑造出來的文化想像？

因此，立足於左翼文化研究的傳統，「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嘗試批判地接合三組相互關連的論述軸線：馬克斯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基進地理學及第三世界殖民論述（特別是去殖民精神分析的論述）。

3. 〈帝國之眼〉一文發表後，《台灣社會研究》十八期刊出了五篇回應的文章，從不同層次深化、補足該文的論點²。另外，李丁讚在即

2. 其中除了鄭文良（1995）〈想像「破國家」〉一文繼續深化「破國家」的理論／政治涵意之外，其他四篇文章大致上根據1994年六月十一日在台北清大月涵堂，由《台社》與清大文學所（現在已經不存在）主辦以〈「南進論述」的批判：資本、國族——國家與帝國〉為題的〈文化批判研討會〉中的口頭報告，改寫而成。于治中（1995）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切入，將「南進」擺在更寬廣的社會／政治空間中操作，補足了〈帝國之眼〉未能關照的場域。王振寰（1995）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企圖解剖〈南進〉的政經意涵，包括對勞工的影響。丘延亮（1995a）從外在於「台灣」的殖民論述視點指出民主的堅持必須反對國族主義與次帝國主義的接合。翟宛文（1995a）最後從具體的

將發表的〈「邊緣帝國」初探〉³一文裡，質疑〈帝國之眼〉提出次帝國的文化想像複製了核心帝國的想像建構，因此是資本主義運轉邏輯的深化；相對而言，他所提出「邊緣帝國」的觀念中明示了與核心帝國模式的斷裂，其中經過「發明」和「轉化」，因此不必然會「回到核心帝國的原點」。對於上述的批評，我基本上接受；我同意複製過程中的轉化與發明因子，主要是歷史存在條件的轉變，時空的不同，面對的情勢也不同，也就不可能是簡單的直接複印。然而，在〈帝國之眼〉分析裡「發現到」這種轉化與發明是極端的粗暴，在挪用日帝文化的想像時，沒有反思過程的中介來自覺到「複製」帝國慾望的感知架構。簡單的說，〈「邊緣帝國」初探〉與〈帝國之眼〉的問題意識不全然相同，有交插重疊之處，也有關切點的不同；前者主要的關切是在捕捉核心帝國與邊緣帝國的差異性，其背後所暗示的理論問題是邊緣帝國的出現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斷裂，以及在倫理學層次上邊緣帝國的連結模式是否較為「進步」，在「蛻讓」過程中與「他者」相融，走出自己、走入對象，達到更高層次的普同主義（universalism）；而後者的問題意識則擺在文化想像的層次，從現實（南進論述）出發，處理其意識形態的構造，解剖次帝國慾望搭建在國族主義上的基地與殖民主義之間的串連，這種介入性論述在理論層次上找尋文化研究在地展開的問題意識，在倫理學層次上提出破國族的文化想像，其內容與形式大致與前者相類似。

李文的論點引用Ashis Nandy (1983) 來加以支撐。爲了深化該

實踐中點破台灣經濟帝國的神話，南進論述所展現的只是「做帝國的慾望而已……既可悲復可笑」(P. 262)。可惜的是，研討會當天有趣的幾個發言，如毓秀〈女性想像與後國家〉點出國家的性／別屬性，呂正惠從國家中心主義立場對〈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國際主義〉的分析，傅大為〈另類區域整合與「東帝汶」屠殺〉，以及錢永祥後來頗具影響力的〈國家主義與威權民粹主義的辯證〉，或許大家忙於各自關注的事物而沒有能以書面文字發表；雖然其中部份戰火延長至一九九五年一月底的〈台社〉七周年會議，也將錄續在《台社》發表（參見王振寰、錢永祥（1995）、夏鑄九（1995）、趙剛（1996）、呂正惠（1995）、江士林（1995）、丘延亮（1995b））

3. 該文於《台灣社會研究》21期，1996，刊出。

論點的重要性，本文將 Nandy 擺回第三世界殖民認同理論的系譜當中，追溯其立論的軌跡，而後提出「批判性混合」(critical syncretism) 的策略性概念。

4. 「批判性混合」的理論效果在突破國族主義本土化運動的困境。如果說第三世界的國族主義及本土化運動的出現是對殖民主義的反動(應)，是去殖民運動的過程，其認同對象由殖民者轉向為自我認同，那麼它仍然是畫地自限地受制於殖民主義，並沒有走出殖民認同的陰影。如果去殖民的意義不能停止在本土化運動，那麼出路何在？最近這一波的本土化運動論戰⁴的格局，仍然無法衝開統／獨國族主義文化想像的界限，其認同對象仍然沒有多元展開。

在以下的文字裡，我將從「去殖民」的問題意識出發，企圖串連看似不連續、有落差、縫隙的多重理論論述空間，去面對當代文化想像中存在的危機。我將核心關切的場域放在「文化研究」這個批判傳統中，透過對其「歷史與理論」的重組、重讀，在糾纏複雜的軌跡中，將文化研究再定位為去殖民運動的重要環結。首先，我把焦點擺在核心帝國「內部」的去殖民運動問題；接著把焦點集中在殖民主義精神分析論述的系譜中討論殖民認同(colonial identification)在不同時刻對對象的轉折，一方面拉出文化研究在核心帝國地理空間之外的另一條由 Fanon 所開展出的批判傳承，另一方面則在找出文化認同經殖民主義全面掃射後危機之所在；之後，我提出「批判性混合」的倫理學原則做為「後殖民」的認同策略，以閃躲殖民主義的複製及再生。在這樣的基礎上，最後，我提出「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將文化研究歷史唯物論的傳承接合到基進地理學地理唯物論的傳統，再注入殖民論述傳統中對殖民帝國主義的核心關切，這個認識／方法論的提出是在提供在地文化研究面對「在地—全球」、「現在—過去—未來」交互辯證的中介過程，從去殖民的文化／政治立場解構長期積累的殖

4. 參見陳昭英(1995)，王曉波(1995)，邱貴芬(1995)，陳芳明(1995)，陳映真(1995)，張國慶(1995)，廖朝陽(1995a、b)。

民文化想像，由其間掙脫出來才能走向後殖民較具解放性的新文化認同。

在進入正文前，先要澄清以下幾點：

1. 本文基本上是在理論層次的思索，所提出的論點相當的初步，諸多理論資源的回溯無法在現有的時空限制下更細緻化的推演。舉例來說，單就殖民心理學／精神分析的部份就至少要一本書才能清楚的交待其變化的軌跡及各個理論所處的歷史條件。或許只有待日後逐步慢慢發展，這個主題至今仍然沒有外文專書的討論，顯示出第三世界殖民論述在文化理論／研究上仍屬萌芽階級。

2. 「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的提出是爲了展開我個人未來「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認識論、方法論的建構無法孤立存在，需要在具體分析中辯證地修正。這裡呈現的只是初步的問題意識，具體的研究問題提出不是本文關切焦點之所在。但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要能走出有意義的在地文化研究需要關切文化研究的朋友們共同對話。

2. 第三世界與去殖民運動

2.1 帝國主體的去殖民

帝國大反撲？九〇年代之後，核心地區文化研究的書市中出現了大批有關帝國主義的論述，其中最受注意的除了 Said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之外，當是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Kaplan and Pease, 1993)⁵。美國帝國主義的研究與批判當然不是什麼新的題材，而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則在於它來自於 American Studies 這個學院空間，首次集體的重新挑戰美國研究過去對美國成爲帝國這個身份／位置的否認；也就是當初這個因美國國族主義而生出的「本國研究」，終究要在多重的壓力下面對自我批判的命運。放在

5. 其他的 諸如 Amin (1992), Pratt (1992), Donaldson (1992), Spurr (1993), Godlewska and Srnith (1994), Blaut (1993), Sprinker et. al. (1995), McCintock (1995)

這一波「帝國論述」的潮流下來看，這本書所反映的是帝國內部去殖民運動的轉捩點。

在過去的用法裡，去殖民主要指涉的地理空間是第三世界，在二次戰後的獨立建國運動；原來的殖民地以獨立建國為手段／目的，脫離殖民帝國的掌握，尋求全面性的解放。劍橋大學的著名史學家 D. K. Fieldhouse，即在其 1982 年修訂 *The Colonial Empires* (1966) 一書時，加入最後一章“Decolonization and After, 1945-81”，討論二次戰後的去殖民獨立建國運動。多元決定的歷史因素，使得去殖民的焦距被擺在第三世界的地緣政治環結中。然而帝國的快速瓦解，難道真是那麼突如其來，不會在之前及之後，在「文化」的層次上經過“內部”的「去殖民」過程？如果按照 Said 的說法，帝國的形成本然要透過文化機器的運轉來自我辯解、定位，那麼在它沒落的過程中，難道就不需要內部的調整、在文化上去殖民嗎？當然，這對戰敗國而言，自省是比較顯而易見的，戰敗的痛創不僅是國家機器的掌握者要面對的，批判性的知識份子更是得冷靜地分帝國析形成的性質，防止傷口癒合後再次的野心復發⁶。相對而言，戰勝國中除了美俄崛起成為超級強權之外，英、法等次級強國也快速地棄守幾個世紀建立起來的殖民地，其內部在文化上的去殖民是如何的進行則似乎沒有成為關切的焦點。

Robert Young (1990) 在 *White Mythologies* 一書中，開門見山的提出所謂後結構主義其實不是 1968 年五月學生運動的產物，而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結果；沙特、阿圖塞、德西達、李歐塔、Cixous 不是出生於阿爾及利亞，就是參與了當時法國內部的反殖民運動。從 Young 的觀點來看，當代思潮對歐洲中心主義 (eurocentrism) 的批判與解構，其實可以歸咎到二次戰後第三世界的獨立解放運動。沙特 1961 年替 Fanon 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所寫的序，即是法

6. Masao Mamyama (1963) 是極具代表性的著作，對日帝法西斯主義的分析。

國知識份子由「內」對歐洲（特別是法國）去殖民的具體表現。如果我們把時間向後推至 1980 年代中期以後至今，在核心地區最具批判力、影響力的理論家如 Said, Spivak, Hall, Blaut 這些人都來自第三世界；這種現象不僅顯示第一世界核心地區文化思維的枯萎，也顯現了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的「貢獻」：其內部的解構仍然需要「外力」才能繼續其未完成的去殖民運動。這種無奈的諷刺反映在 Young 的整本書中；他一方面認識到第三世界的去殖民運動，造就了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操作又完全在西方傳統之中，再次鞏固西方中心的陣地，而沒有走出自我，走向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印度、加勒比海……當然，這可以被解釋成避免再一次的思想領土的擴張和再殖民，但是這又何嘗不是自戀式的防衛性機制？

Young 的書寫邊界反映了整體「帝國論述」的關切所在：帝國主體的自我。或許到了下一波的風潮中，我們會看到帝國主體如何在文化層次上提出更為尖銳的問題：帝國對殖民地造成了什麼文化「後遺症」？這些無法恢復的摧毀又如何在現實的現在／未來世界中支撐永不平衡的權力地形圖？或許這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而不是「他們」。更諷刺的是，我們「外來的」知識管道，已經被既有的出版體制所規定⁷；除非韓國知識份子在地文化生產能夠進入發行的網線，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她們在想什麼？知識生產無法脫離多重結構存在，全球資本主義下的新殖民結構雖然不斷的變化重組，而歷史的積累所劃下的軌跡，多元決定了有中心點的放射狀圖形。想要打破根狀組合，完全由雜草糾結的圖形來取代可能很困難，如何把原先不相接連的樹葉、枝幹拉在一起互相滋養，又不需要砍斷難以拔起的樹根，或許是比較可能的策略。

2.2 馬克斯主義與去殖民

7. 有關出版在國際層次的流通與壟斷，參見 (Altbach, 1987)。

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造就了「後結構主義」？Fanon 指出：「去殖民經常是暴力的現象」（1967：35）。在戰爭的狀態中肉體暴力與象徵暴力已經無法區分，它所造成的精神失序往往得經過世代才可能「恢復」，恢復的不可能是「原狀」，恐懼、痛快、興奮都已經成為身體內部的記憶，成為主體性結構的物質基礎。然而非戰狀態的殖民情境不是更為全面性地日常生活暴力嗎？這種更為長期的模塑能夠在獨立建國的亢奮狀態中被一掃而空、被完全治癒嗎？它可能被治癒嗎？暴力的記憶把受害者與施暴者永遠的捆綁在一起，敢去面對、談論暴力的場景，都是去殖民的重要環結。

如果去殖民的動力在殖民暴力開始施展的那一刻已經埋下了火種，那麼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暴力只是火種群全面性的引爆。力量的聚合來自四面八方，不僅是空間的會集也是時間軸的壓縮。

對於第三世界地區的知識份子來說，不管是身處亞、非、拉美，或是倫敦、巴黎，去殖民的思想來源、理論武器並不只是厚重的殖民經驗，也來自於殖民主義「內部」的去殖民力量。其中，不論在思想或是在政治實踐上影響力最大的莫過於馬克斯主義。

這裡的目的當然不是在清算馬克斯主義的功過得失，而是將它放在漫長的去殖民史裡來看待。十九世紀中葉正處於歐洲殖民帝國主義的高峰時期，工業革命帶動了工業資本的向外擴張，馬克斯主義在此時「發現」了「資本主義」及其歷史的作用者——工人無產階級，這種「命名」（naming）本身就預設它的「外在」發言位置：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這種未來式的想像不僅僅只是在對帝國體質激進的解構——捕捉它運轉的邏輯，同時也為重構劃下了烏托邦式的藍圖。也正是另類思維的出現，對於另類世界的嚮往，帝國主體的內部開始積累了一個半世紀無法清除的噪音。半個世紀以後，1917 年蘇聯革命的成功，想像世界向前推進，馬克斯主義的革命理論首次被「證明」不只是白日夢；它為資本主義的內部去殖民力量注入了強心針，也為殖民地的反殖民運動提供了不同於資本主義另類選擇的可能性。在今天重

提蘇聯革命顯然是極端的諷刺，從兩種體系的競爭，到「三個世界」的形成，到冷戰的結束，國家中心主義世界觀下的社會主義堡壘（古巴、中國、越南……）都已經快速地被吸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磁場之中，這段歷史要怎麼寫？當然最簡單的寫法是跳過這整個世紀，假裝它從不存在。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跟帝國主義一樣，馬克斯主義並未因此而被宣判死亡：它的批判性因子已經滲入各種地理場域之中，隨時都可能被叫回來，面對一些不解的狀況。簡單的說，馬克斯主義的傳統已經建立了一種外在觀點對資本主義的內部批判；這股去殖民的力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裡與不同的因子相結合，以不同的面貌出現；重要的是，一旦跳出國家主義的牢籠，不以奪取政權為必然手段，馬克斯主義的投射場域也就變的無所不在了。這種認識也只有將去殖民當作永久的「寧靜革命」才有意義吧！

在理論層次上，十九世紀的馬克斯主義並未完全意識到它自身的歐洲中心主義，卻都在效果上造成了一連串的「去中心化」的運動。歷史唯物論在與唯心論的交戰過程中，將人類社會的活動、制度徹底的歷史化，視資本主義為歷史的產物而沒有存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它又承繼了啓蒙傳統進化論式的史觀，以全稱命題的敘事包超了所有的地理空間。也正是在這種衝突矛盾中，普同主義的核心產生了部份的裂縫，慢慢地開始浸蝕信心十足的“Universal Subject”。多元階級主體的“誕生”其實是將傅科一世紀後所拉出的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共生性議題，搬上了理論的政治舞台；權力的微生物學的召喚是馬克斯主義經過尼采手中必然導致的理論推演。接踵而來的是一波波擋不住地認識論的斷裂：資產階級、第一世界、男性、白人、異性戀……都無法不在後續的歷史運動中逃離去中心化的命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父權體制、種族歧視、異性戀體制……一再的“誕生”，與佛洛伊德“發現”潛意識一樣，都產生了一發不可收拾的革命性效果；放在地理政治的場間中來看，這些平行勾連的軸線都是核心地區（內部）去殖民運動的歷史軌跡；然而一旦接合到帝國主義史所造就的「全球

化」運動，跨地理性地象徵性連結超越了物質性的界限，在地的局部性差異也就無法聲稱其絕對的自主性。

3. 「殖民認同」的理論軌跡

3.1 精神分析與去殖民

如果「去殖民經常是暴力的現象」，那麼多元主體的浮現也帶來了暴力的效果；它不僅挑戰了帝國化的主體，刺穿單一體制的迷思；另一方面，主體、群體及次文化的差異、斷裂、切割、流動性必須同時面對現實世界中國際化、全球化的壓力：兩者之間不斷地穿透、辨證、衝突就造成了文化認同的危機。這種危機四伏的狀態表現在多重力量對於具體個人（多元主體位置）的拉扯，往往不給予足夠的時間及空間來處理認同的迫切性。後現代文化理論所提出的精神分裂主體、游牧主體……足以描繪“客觀”現實，提供倫理學的正當性，但是並不能深刻地捕捉精神分裂在現象學層次的痛苦，提供療傷的策略。對於主體雜種性（hybridity）的歌頌，往往來自資源豐厚、經濟基礎充裕的發言位置；以少數特權者處境的良好來置換結構性產生的不安全感。事實上，當我們再次把多元主體的浮現還原到去殖民運動的過程裡來看待，弱勢主體的文化資源及歷史傳承是相當薄弱的。雖然大量歷史書寫企圖重新找回過去的立足點，但是都無法在短暫的積累中對抗長期所養成的多重體制，所形塑出的殖民宰制機制：語言、制度性的配置、儀式的慣性化、文化範疇的層級化……都不是短時期可以扭轉改變的，更何況抗爭主體還得依附在既有的法則中運作，片面地再次複製部份的關係結構。一旦浮現在社會空間的慾望碰上（象徵）秩序的反撲，精神分析的空間就變的極為脆弱，不是面臨滅頂的危機就是得重新召喚反動的防衛系統來求自保。

我不斷企圖想要強調精神分析空間層次的重要性，預設地是它無法被化約、消抹的普遍性運作事實。只有在我們充份面對精神分析空

間內在機制的細膩性時，才能發展出不致於自毀而又能步步為營向“前”挺進的策略。歷史經驗一再地告訴我們，多少的創痛發生在精神身體的銘刻上，但是這些經驗並沒有得到有效地傳承，不應一再發生的悲劇不斷的上演。因此，殖民的精神分析是去殖民精神分析一體的兩面；更精準的來說，去殖民精神分析的起點就是對殖民狀況的認知。當然這裡所講的精神分析空間已經與社會空間交互連結，慾望生產與社會生產無法一刀切斷，它們的內在法則不同，但是交互流動的軌跡將它們鎖在一起。

3.2 「殖民」心理學

可以想像的是，殖民心理學的推展者不會是被殖民主體，殖民帝國為了能夠有效地掌握殖民地，不論是為了認清他所不熟悉的被統治對象，或是企圖營造、改變、“教化”這片心理空間，它都必須發展這門知識。這也就不難了解“成果”最豐富的存在於法國。

根據 François Vergès (1995) 的研究，殖民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十九世紀初期的「人民心理學」⁸。它的目的是在釐清人種、文化與心理的關係；它的問題意識就是在面對法國工人階級，貧農在社會上所造成的失序，如犯罪、酗酒、反叛，從而尋找防治的策略。社會心理學家認為透過“人種記憶”徵候的研究，能夠理解社會群體的特性。因此，法國的心理學及 psychiatry 的發展就是在研究這些“危險階級的病態”表現的“科學”。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些研究對象也就是社會內部的被殖民者。

十九世紀末期，人民心理學的研究場域被擴大到殖民地，原有的理論也被應用到被殖者身上。借用 Gustave Le Bon “心理人種”

(psychological race) 的觀念，Léopold de Saussure 在 1899 年的著作中提殖民出地社會是經過遺傳來複製心理特質。1922 年 Lucien

8. Vergès 的研究非常清楚地整理了整套問題意識發展的系譜。以下的討論受惠於她的研究。

Lévy-Bruhl, 應用圖爾幹“集體再現”的概念來研究“primitive mentality”；他認為這整套觀念系統統攝了原始人 (primitive people) 的思考、行為及感受。殖民心理學在此時期與其他的殖民論述相互競爭，認為最有效的同化方式不是透過強加的力量，而是透過誘惑 (seduction)。1947 年 Georges Hardy 在《人民心理學期刊》(*Revue de Psychologies des Peuples*) 發表了深具影響力的文章，「殖民地人的心理學」，批評以往的研究都是以一個文明的標準來評斷，表現出一種愚笨的自大 (egocentrism)；他認為殖民心理學家首先要挑戰的問題就是 universal man 的觀念，甚至「黑人靈魂」(negro soul) 都是過於大膽的推論，因為個人之間的差異大到無法簡單地普遍化的程度。企圖以「族群家庭」(ethnic family) 來取代人種 (race)，Hardy 同時認為在殖民地，心理學與政治學要結合在一起，才能增進人們之間相互的理解與合作。然而 Hardy 的提法並未造成殖民心理學上的斷裂。作為殖民地的行政人員，他一方面受限於實證主義在理論上主導了一般心理學，另一方面在政治層次上他論述的前題仍然是在如何將殖民地「同化」，他說：「殖民必須清楚地知道它所操作的群體，心理學已經成為為了它準備的知識，其必然性是非常明顯的」(Vergés, 1995: 427)。

整體來說，殖民心理學認識論的政治潛意識是父母與小孩的關係。被殖民者的語言貧乏，無法將事物清楚的概念化；他們相信無法解釋的超自然力量，相信宿命論，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於對前人盲目的模仿，永遠都不能成長為大人。因此殖民者要引領他們逐漸成熟，進入成人世界。當然這整套前提躲藏在科學的名號之後：他們觀察視野的有效性建立在科學中立客觀的保證上。

殖民心理學認識論的斷裂到了二次戰後開始浮現，也正是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洪流開始衝擊的時刻。

3.3 殖民者的告白？



根據 Vergés 的論點，殖民心理學去殖民化的重要起點是 Octave Mannoni 在 1950 年出版的 *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與以前論述的轉捩點在於他開始揪出殖民關係裡以前的藏鏡人——殖民者，開始追問殖民者的心理狀態。換句話說，以往的殖民心理學把殖民者隱藏起來，研究者以科學的面貌出現，關心的是殖民地的心理狀態，而研究者自身的殖民發言位置只是缺席的存在，現在箭頭同時指向殖民者，預設的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辯證相互建構性，殖民「關係」從此成為論述的焦點。從 Mannoni 到 Fanon 在 1952 年出版的 *Black Skin, White Masks*，殖民心理學透過精神分析進一步的被基進化，成為對抗殖民主義的武器。1957 年 Albert Memmi 的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1960 年 George Lamming 的 *The Pleasures of Exile*，一直到 Ashis Nandy 1983 年的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及 Ngũgĩ wa Thiong'o 1986 年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大都在去殖民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問題意識下進行。

半世紀以後的今天來重讀 Mannoni，我們無不法不將他的論述視為一種殖民關係的徵候群，它一方面是對殖民心理的剖析，一方面是殖民者的告白，整本書必須從他的主體發言位置來理解：作為法屬殖民地的情報官員，企圖要解釋 1947 年馬達加斯加的反殖民的抗暴事件（十萬人死於對抗中）；雖然他明顯地反對殖民式的剝削及種族歧視，但是他的目光又完全受制於歐洲中心的文化觀點——莎士比亞的 *Prospero* 及 *Caliban* 人物框住了他的整套論點（1950 年版本由「國際事務皇家研究中心」的種族關係研究部門主任 Philip Mason 寫序，其中充滿了種族歧視及刻板印象的語言，可以看出當時「研究」中「認識論的限制」。重要的是殖民者的自我解剖何以直到此刻——二次戰後——才逐漸展開？置放在二次戰後去殖民運動的潮流中，Mannoni 可以被視為替殖民者在轉換過程裡，逐漸撤離殖民地所提供的心理準備，

這種不確定性裡充滿著喪失特權的鄉愁，甚至於恐慌，很少殖民者有這種「勇氣」去面對其自身的心理狀態，Mannoni 的貢獻即在此。因此這本書較為準確的定位應該是殖民者自我去殖民的文本，它的來源是客觀歷史條件所造成的壓力⁹。

Mannoni 的基本論點是，殖民心理學是兩種扭曲人格的交會：殖民者的「自卑感」(inferiority complex) 與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他的整套理論架構奠基在演化論式的幼兒成長生命史，而後將它放到具體的歷史文化環境中來看待。幼兒出生後就慢慢經驗到它對父母的依賴，物質生存條件、社會化的學習、知性的發展……都與父母產生依賴關係。這種早期的生命經驗就形成愛恨糾結的依賴情結、小孩長成的斷裂點是被父母拋棄的恐懼，這種恐懼一方面可以促使它人格發展的自主性，走向理性的個人主義心態；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不自信的「自卑感」，這種情結被轉化成對父母的揚棄，透過對他人的宰制來壓抑潛意識的罪惡感。被送到殖民地的殖民者就是歐洲發展史這個人格面向的表現，而被殖民者永遠沒有長成，停滯在幼兒「依賴情結」的階段。一旦這兩種狀態碰到一起，就形成了互補的共生關係。

很明顯的，Mannoni 的論述效果正當化了殖民主義，甚至與早期殖民心理學的潛意識——父母引領子女走向成熟——沒有太大的差別；雖然他同時把殖民者拉下水，指出他的「病態」心理，卻無法更為後設地解釋這兩種心態存在的歷史條件，除了訴諸簡單的幼兒成長圖像。一旦幼兒長大的故事被質疑，這種全然「心理學化」的解釋就被全盤動搖。特別是在 Mannoni 最後提出的「該怎麼辦」的部份，展示了他殖民政策者的角色，將自決、自治的機構交給由長者及「祖先」的手中，由「下」一個層級的「父母」接手，才不致使馬達加斯加經過被「遺棄」的心理痛創。於是傳統的村落會議，Fokon'olona，在

9. Maurice Bloch 在 1990 的新序中對原書的論點及支撐的資料做了一針見血的批判。

法國殖民體制淡出的過程中成為殖民主企圖交接的對象。這是否意味著 Mannoni 對政策的直接影響，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支持，但是卻清楚地看到他的論述位置與殖民體制的接合點。Fanon 對他的攻擊中讓我們看到了被殖民者的立場及世界觀。

3.4 去殖民的精神分析

相對於 Mannoni, Fanon 的書寫充滿了憤怒、情緒及爆炸性的慾望，但是其間又不乏冷靜的反思。他所傳承的書寫方式是比他更早一個時期的 Aimé Césaire。同樣出生成長於法屬殖民地 Martinique 的 Fort-de-France，同樣的在巴黎受的高等教育，Césaire 與 Fanon 深受巴黎左翼思潮的衝擊，遊走於兩種語言、兩個世界、兩個人種之間，這種同時的「內在與外在性」給予他們思考與論述的可能性，為第三世界反殖民論述留下了開拓性的資源，也對於“歐洲”、“美國”、“西方”的挑戰提供了帝國內部去殖民的刺激。

Fanon 精神醫學的訓練及被殖民的經驗給予他特有的發言位置。如果說 Mannoni 是殖民者的告白，那麼 Fanon 則是被殖民者的自我剖析。Mannoni 將「依賴」視為被殖民者的屬性，「自卑感」當作殖民者存有的基本性質，而 Fanon 則認為這兩種情結互為一體在被殖民者身上體現；對於後者而言，殖民者的自信、傲慢與自大不可能是「自卑」的表現。對 Fanon 來說，被殖民的情結完全是殖民體制所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它根本的來源是經濟的掌握與剝削，導致卑下意識的全面性內化 (Fanon, 1967: 11)。因此黑人的異化絕對不是個人問題，更不只是心理問題，客觀的社會結構與主觀的心理結構相互深化，因此，「黑人必須對兩個層次同時宣戰」(P. 11)。這是 Fanon 與 Mannoni 最大不同之處。

Fanon 在《黑皮膚，白面具》裡開宗明義的點出他的發現：「黑人不是人」，「黑人要的就是成為白人」(P. 8, P. 9)；「白人認為他們黑人比優越」，「黑人不惜任何代價要向白人證明他們的思想一樣的豐

富、他們的智慧、知識有一樣的價值」；「對黑人而言，他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白人」。而黑人的「證明」只有白人的「認可」才能成立，什麼是認可，真正的認可其實是永遠的危機，永遠的不可能。「我相信黑白人種的交會造成了龐大的心理存有情結。我希望由分析它去摧毀它」（P. 12）。這是 Fanon 基本的立足點。透過語言、性關係（黑女人／白男人，黑男人／白女人）的實踐場域，Fanon 企圖「證明」他的觀察。

Fanon 看似簡單的「發現」其實是具有革命性的意義。被殖民者對殖民者在精神分析層次的認同，在 Fanon 之前，未曾被如此赤裸裸的指出過（pronounced），對於被殖民者所造成的震撼亦是空前的。Césaire 所代表的反殖民論述傳統及 Negritude 運動都被迫使重新認識及面對被殖民者的自我，必需重新釐清自身慾望投射之所在，及已經成型的被殖民主體構造；對於白人殖民主義的攻擊（不論是在論述、實踐及心態），對於黑人文化傳統近於全面美化的肯定，在潛意識的層次上都可能是期待殖民者的認可。對 Fanon 來說，「黑人」是白人殖民者強加、反彈的建構，其認同對象並沒有徹底的移轉，這也是 Fanon 對於 Negritude 運動一直持有保留的態度，未經全面性的自我分析，從「漂白」到「漂黑」都無法看清潛意識慾望流動的方向。Fanon 所開啓的問題意識在半個世紀之後仍然有助於我們看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情結，這些情結並沒有成為歷史記憶逐漸散去，反倒框架出人種、國族、種族間互動的軌跡。

用理論語言來說，Fanon 的問題意識是：黑人的被殖民主體性是如何形成的？黑皮膚何以會要戴上白面具？在長達四頁的註釋裡，Fanon 借用了拉崗的「鏡像期」理論。他這麼說，「無庸置疑，對白人來說真正的他者就是，也將持續是黑人。反之亦然。只是對白人來說，他者是在身體意像的層次上被認知成絕對不是自我；也就是不能認同也無法同化。而對黑人而言，正如我們已經分析過，歷史與經濟的現實進入了這個圖像。拉崗說，“主體在鏡中認識他自身意像的這種現象

對這一個階段的分析，有雙重的重要性：這個現象發生在六個月之後，並且在那時的研究非常有說服力的顯示，對主體有設定現實的傾向；鏡像，正是因為這些接近性，提供了那個現實很好的象徵：它的感知價值，如同意像的幻想，及其結構，正像它反映了人的形式一樣”

(P. 161)。Fanon 在此借用拉崗的鏡像期必須被放在殖民狀態的脈絡中來理解。由於殖民史的經濟宰制，整體的象徵秩序是由「白人」所影射的意識形態結構所駕馭，其得以界定他者的作用者 (defining agent) 全然殖民自者，在「他」的架構下來進行。兩者的主體形成雖然相互建構 (constituting)，但是白人的優勢權力位置把黑人化約到膚色的生物層次來對待，身體的差異性成為「標示」(marking) 白人主體的邊界；對白人而言，這與經濟與歷史無關，是普遍性 (universal) 的差異，只有當黑人能夠脫離他的身體，全然進入白人的象徵秩序所代表的價值體系時，黑人才能成為「人」。透過白人的眼睛，黑人的自我認識被界定的作用者所規範，他只是「半人」，是不完整的主體，只有成為白人，才能變成人。顏色的區分成為無法跨越的鴻溝。重點是顏色的高下是那一方在決定？放在那一套象徵體系裡來評價？在「單一」(oneness) 的架構中，作用者被隱藏起來，使得問題不能被問也無從問起。「白人」在認知的世界中是在區分種族的範疇之「上」，是不容質疑的先驗性範疇。在這個象徵體系中，「黑人象徵的是生物性的」(P. 167)，他所帶出的意象是陽具、是運動員、拳擊手、軍隊、動物、魔鬼、罪惡……(P. 166)，「不管到那裡，黑人還是黑人」(P. 173)。因此，只有戴上白面具，他才能去除他的焦慮。永遠的缺乏 (lack)，永遠的「不太對」，永遠的自我懷疑，永遠地被鎖在白人所劃下的牢籠中。

在 Fanon 對 Mannoni 的批判中，我們讀到了基進精神醫學的提出。「作為精神分析者，我應該幫助我的病人逐漸意識到他的潛意識，放棄他自我“漂白”的企圖，同時幫助他採取行動改變既有的社會結構」(P. 100)。對於 Fanon 來說，在既有的架構中，黑人只有死路一

條，他的精神結構永遠處於瓦解的危機中，漂白的潛意識慾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夢想；只有在拒絕做奴隸的時候，主人才會消失（219）。

這裡我們有一連串的問題可以提出：放在具體的社會空間裡，認識無法取得的潛意識慾望要在什麼程度裡才能宣告完成？其間的阻力是什麼？在殖民體制壓制機器的包圍下，在公共領域中的集體分析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否解釋了文化去殖民的精神分析並需在帝國瓦解的環結裡才可能展開？有多少像 Fanon 一樣的精神分析師能夠盤踞殖民體制內的戰略位置？就算分析得以完全的展開，改變社會結構的行動資源基礎又在那裡？殖民史的歷史運作是否已經轉換了殖民前的文化因子？換句話說，抗拒的支撐場域足夠龐大嗎？殖民結構在形式上的去除（白人的離去），就能改變長期的精神結構嗎？從殖民結構轉換成新殖民結構的歷史經驗是否意味著精神結構的再次轉換？殖民狀態僅僅只是在經濟基礎上的種族分野嗎？

3.5 多重「殖民」

Fanon 想要改變的社會結構到底是什麼？是單一的還是多重的結構？Fanon 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在同一頁中（P. 100）社會結構分別以單數及複數的形態出現，這種模糊性迫使我們走向兩種詮釋的可能性：1. 單一結構指的是殖民結構所營造的種族歧視，2. 多重結構則指向多種形式的壓迫結構。在與 Mannoni 過招時，Fanon 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場，「殖民的種族歧視與其他的種族歧視沒有不同之處」（P. 88）

「所有形式的剝削都是一樣的」，它的對象都是「人」。如果如此，去除「殖民主義」有必然的優先性嗎？Fanon 所處的歷史環境是領土的殖民主義（territorial colonialism），這也是他關切的焦點。但是對於殖民主義的思索也讓他看到多重宰制結構的存在。雖然他的論述後來受到許多的質疑，諸如他的男性觀點，對於異性戀體制的忽略，他的男性沙文主義及同性戀恐懼症等等¹⁰；然而沒有評論者能夠全盤否定他所開啓的問題意識。一方面他的問題意識被推向第三世界的獨立建

國運動及所謂後殖民時期的特定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則被全面性的展開，處理多重歷史結構性的宰制關係。兩條路線同樣地都在去殖民的軌跡中運作。在他所提出的問題裡，「殖民」的意義已經被轉化，擴大到廣泛的指涉任何具有歷史結構性運作的權力宰制關係上。例如同志評論者 Diana Fuss (1994) 從同志理論的觀點重讀 Fanon 後，在結論中提出 Fanon 的貢獻：「Fanon 對政治思想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精神的 (psychic) 正是一種政治形構的操作”的批判性概念。Fanon 使我們注意到認同的歷史及社會條件。他提醒我們，從來不外在於或是先於政治，認同經常銘刻在特定的歷史中：認同所命名的不僅是主體的歷史，也是在歷史中的主體。最後，Fanon 所給我們的政治不反對反而是根本的預設了精神分析的」(P.39)。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運動能量讓我們看到不同政治認同的可能性。重要的不只是認同存在的歷史條件，更是它足以形成的特定歷史軌跡。

3.6 新殖民與「內部」殖民

如果說 Fanon 的吶喊發生在二次戰後獨立建國運動熱潮的起點，那麼去殖民精神分析在殖民主撤出後是否就宣告結束了呢？如果不是的話，它所面臨的問題又是什麼？

阿爾及利亞在 1962 年宣告獨立。Fanon 自 50 年代起加入獨立戰爭，1961 年發表了深具影響力的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大地之不仁) 一書。參與獨立運動的過程裡讓他清楚地看到所面臨的問題。在「國族意識的問題」一章中，他沈痛地指出所有的困難：殖民者的淡出留下的是原有的殖民關係結構，整體的狀況「戴上了新殖民主義的面具」(P. 152)，特別是在精神分析結構的層次上，國族資產階級認同的是他們長期學習的對象——西方的資產階級，更糟的是他們沒有

10. 最近對於 Fanon 批判性的重讀，參見 Bhabha (1994)，Fuss (1994)，Gates (1991)

學到開發創造就直接跳到佚樂的追求，成為延續殖民關係的中間人。Fanon 再度大聲呼籲國族主義必須以社會政治意識為基礎，進行全面性的改造，否則會甚至較以往更為反動，造成混亂、壓迫及自利地搶奪大餅。Fanon 的觀察與預報到底有多少的真實性？

1985 年，「南方—第三世界雜誌」(*The South*) 與維也納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在維也納主辦以「去殖民及其之後——第三世界的未來」為題的會議，邀集亞、非、拉美及加勒比海等地實際參與政治過程的官員，共同檢討各地的去殖民經驗。巴基斯坦籍「南方」雜誌主編 Gauhar 對於南亞的描繪，精要地劃出了去殖民運動卅年的經驗，「人們很快的就發現到，唯一改變的是主人的膚色……獨立帶來極少的改變，他們依然被鍊鎖在相同的英式機構，透過這些機構統治精英操弄、控制來持續他們自己的優勢……英式機構及統治階級的架構大都沒有改變……，對大眾 (the masses) 而言，獨立的成果是他們抗爭的結果，也是夢想的終結……國族主義無法遮蓋經濟社會面的差距，也不能拉住區域性自主的壓力……當文化的同質性與真正的國族意識無法逐漸出現時，人們就開始在他們傳統的狹隘及階級的認同中找尋自己的安全感……在殖民時期裡所撒下瓦解的種子，在現在已經到達了苦澀的成熟狀態。」(Gauhar, 1987)。這一段來自第三世界的自白，當然不是對過去外來殖民政權的戀舊，或是企圖正當化殖民主義，而是一針見血的指出外來殖民的形式上終止，內部殖民的正式登台演出，特別是在殖民時期之後，內外的連結使得它的區分已經難以清楚的辨視，讓人進一步質疑由膚色、種族的差異來區分統治的正當性與否，到底意義何在？「我族」統治相對於「外族」統治必然是一種「進步」嗎？

3.7 去殖民的文化想像

印度民間學者 Ashis Nandy 在 1983 年《親密的敵人：殖民主義下自我的失去與再生》裡，承續了 Fanon 的問題意識，移轉到殖民過

後的印度社會裡進行分析。Nandy 開門見山的指出「『進步』的辭令用內部殖民主義的事實來對付受外部殖民主義所支配的社會文化，而內部殖民主義也回過頭來用外來威脅的事實自我正當化，自我延續。但是這個世界已經逐漸地認知到這兩種壓迫的形式必須都同時被去除，無法只去除其中的一種」（1983：XIII）。相對於 Fanon 的迫切感，急於清除殖民主義在殖民地的全面性操作，Nandy 似乎掌握了更充份的時間與空間，重新清理殖民主義所深植的力量。對他來說，殖民主義的侵蝕力在於它能夠創造整套世俗化的層級範疇 (hierarchies of category)，駕馭了傳統的秩序；在殖民體制離去後，這套新的秩序依然長存。對他來說，接踵而來所面臨的「第二種形式的殖民」(second form of colonization) (P. XI)。這一波的殖民主義在殖民社會散放了它的力量，改變了文化上的優先性；它不再以殖民者的姿態出現，大寫的「西方」不再只是地理及時間的實體，已經被普遍化成為心理的範疇：「西方現在是無所不在，在西方內部也外在於它；在結構裡也同時在心理」(P. XI)。如何在文化實踐與文化傳統中找尋未經殖民主義所「污染」或折斷的資源，與「西方」對抗是他主要面對的問題。

Nandy 所說的第二波殖民主義大致平行於一九六〇年代之後的文化帝國主義化論述，在前一個歷史時期這整套後設敘述（“進步”、“科學”、“理性”、“啓蒙”……）被用來正當化殖民主義；在歷史沈澱擴散的過程中，它成為具有普同性 (universality) 的“文化想像”，成為第二波殖民主義的（精神）物質基礎¹¹。因此，Nandy 所捕捉、攻擊的焦點即在於連結、持續殖民主義的文化想像想像形式與內容，任何的論述，就算是過去的反殖民論述只要以這些詞令來自我辯解，都無法接受，都是與殖民主義共謀。Nandy 對“西方”並非全盤的否定，而是針對其所有與殖民主義共謀的部份，但是在實際的論述效果上他確實建構了“西方”與“非西方” (non-west) 在文化想像空

11. 對我來說，Nandy 的分析層次已經不在過去心理學的層次，非行為—經驗主義的認識論的操作場域，因此我稱之為文化想像。後詳。

間的兩大塊鐵板。走到最後，其實是兩種普同主義之間的競爭與對抗，問題是那種普同主義是有「更高層次」(higher order)，更具道德的正當性，更不具殖民性格，更不與擴張主義共謀？這就是我前面提到 Nandy 所企圖重新挖出的文化資源：「一種不具英雄性格的批判性傳統主義 (Critical traditionalism)，發展出一種面對新型邪惡經驗的敏銳感……一種批判的意識流：這個重新詮釋傳統的傳統，爲了要創造新的傳統」(P. XVIII)。這種對傳統的再發現其實正是一種另類神話的構築，其來源在於殖民現代性的受害者 (victims)；在「現代主人」與「非現代的奴隸」之間，只能選擇奴隸，不是因爲同情而是因爲他「代表了更高層次的認知，將主人也當人看待；而主人的認知必須將奴隸當成“物”排除在外」(P. XV-XVI)。這種不同於過去兩個世紀西方主流普同主義所預設的主體位置，雖然活在西方的宰制中，但是不是在殖民主義所架構、界定的空間運作，成爲反對它的鏡像倒影，反而持續結構的再生，而是一種「非玩家」(non-player)，「局外人」(outsider)，他們「建構的西方爲的是讓他們能夠與另類的西方共存，同時抗拒擁抱西方主宰性的自我」(P. XIV)。因此，Nandy 的神話構築裡也涵蓋了西方內部在歷史過程中對於殖民主義的回應 (PP. 35-48)，如 Kipling, Orwell, Wild 及 Charles Andrew。但是對西方最具有顛覆性的回應則來自於以甘地爲代表的“批判性傳統主義”。

甘地的「非暴力」哲學，根據 Nandy，是甘地企圖將它建構成印度教(Hinduism)的真正核心，是印度文化的美德(virtue) (P. 51)。在甘地之前的英國殖民統治裡，對暴力者 (aggressor) 的認同，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被統合在一起，以暴治暴、取而代之是被殖民者的心理認同機制 (Fanon 的基本論點)。而甘地的非暴力不是另一種極至：完全被動；而是一種去除暴力的勇氣與基極性 (activism)。如果說西方殖民主義是「男性特質」(manhood) 的彰顯，那麼甘地的非暴力則是對母性、女性特質的挪用，是「男人的女性特質」(femininity in

man) 的策略。Nandy 指出：印度女性特質的傳統意義包括了「她」與權力及基極性的親密關係：「女性原則是更有力量、更危險、更無法控制的」(P. 53-4)。甘地之所以能擊敗殖民主義就是轉化使用了印度哲學的傳統女性特質。這種更高層次的普同主義是「母性」的表現極至，因為「甘地要解放英國人，正像他要解放印度人一樣」(P. 51)。這裡我們當然要點出「甘地」(至少是 Nandy) 男性發言位置的盲點；在他(們)的範疇裡並有沒有看到「女人的男性特質」(masculinity in women)，更沒有成為思考的可能性，在效果上仍然是從男人觀點「使用」女性，鞏固(印度?)文化邏輯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透過同樣的論述策略，Nandy 企圖重讀甘地的史觀，並且將它論證為更高層次的普同主義。在 1994 才出版的 *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elf* (國族主義的非法性：泰戈爾及自我的政治) 中，Nandy 更清楚的論證他所謂的東方式的普同主義。Nandy 指出國族主義是殖民主義的副產品，第三世界的國族主義者認為沒有國族—國家及應有的國族情感 (sentiment) 就是一種落後 (backward) 的表現；因此戰後獨立建國運動就是對殖民主義的反動，但是仍然持續了殖民主義的思考架構。也正是在發現國族—國家以「進步」姿態出現時，Nandy 再次重訪泰戈爾，從他的思想／實踐中找出脫離國族主義的困境。Nandy 的基本論點是，從泰戈爾到甘地，他們都不願意看到印度社會出現「國族—國家」取代了印度文明的思考方式；如果只以國族—國家來評價印度，那麼就徹底窄化了「印度性」(Indianess) — 印度文明的統合性早已存在，無需被迫臣屬於當代的國族—國家架構下。因此對泰戈爾而言，國族主義逐漸喪失了正當性，而甘地則在這個概念裡注入對它的批判；對二者而言「印度的自由運動不再只是國族主義深化的表現；它取得了新的象徵意義，就是普遍性地爭取政治公平與文化尊嚴」(P. 3)。

3.8 文明主義與小主體性

Nandy 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泰戈爾、甘地的思想，如果不是印度國族主義，那麼可以被稱為印度文明主義 (Indian Civilizationalism)，這種立場所投射的或許是「後殖民時期」的認知：國族主義已經不是萬靈丹，一旦被吸到全球資本主義的磁場裡，國族一國家的層級化架構延續了殖民主義所建構的排比順序，這個時候只有請出文明體系這卦金創藥才能重新縫合從以往到現在的創傷。Nandy 相當自覺地知道自己在創造神話，重新發明人民想像空間裡所熟知的符號（泰戈爾、甘地……）為的就是重建「印度」的自信心，能夠以更為崇高的普同主義「至少」在文化想像中戰勝西方。這或許就是後殖民的精神分析機制吧！

斯里蘭卡裔的人類學家 S. J. Tambiah (1986) 在分析斯里蘭卡的族群矛盾時指出，雖然有族群差異及族群層級的存在，斯里蘭卡人在國外時又非常的

「自傲與自大：他們認為他們比印度人、馬來人、中國人，甚至日本人來的優越。因為他們的眼睛看到的是西方，特別是英國，從十九世紀初至 1948 年間是他們的殖民統治者。他們很自豪於他們英國人的外表：他們的精英比印度精英同化的快的多……英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學制及運輸系統，因為它比較小，較龐大的印度大陸來的更有效率。因此，雖然在許多方面，印度無可否認的是他們的父母，所有的當地人（辛哈歷斯、塔米爾、回教徒）都會很惱怒，甚至是氣憤，如果斯里蘭卡被誤認成印度的一部份（就像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會這麼認為），或是被視為文化上是“印度文化圈” (greater India) 的一部份（就像有些印度人會這麼作）」 (p. 1-2)。

Tambiah 文化地理學的分析對象是斯里蘭卡，但是如果把「斯里蘭卡」置換成「韓國」、「紐西蘭」、「香港」、「台灣」……，把「英國」置換成「美國」、「日本」、「澳洲」、「中國」，似乎仍然可以成立，浮現

結構性的相似性。這種「文明主義 v.s. 小主體」承續殖民主義及新殖民結構關係下的文化想像，其中的特定性可能不同，但是形式邏輯却極為類似。一旦「眼睛看到是西方」而不是弱勢地區，就會繼續複製殖民層級（如稱弱勢國家為「小朋友」），阻擋了與「多元它者」互動的可能性。比較研究有其政治意義即是在暴露這種結構性呼應（homologous）關係的文化想像，也才可能有意識地、批判地突破殖民文化想像的僵硬結構。如果我們相信「西瓜靠大邊」的欲望不是「天性」，不是「人的本質」，而是歷史的建構，那麼突破精神分析的障礙就是在掃除「小主體」的不安、「文明主義」的傲慢，使得認同對象可以多元移轉，形成多層次網狀的相互穿透，而非由一個（甚至少數幾個）中心點的幅射圖形。

更後設的來看，「中國」、「印度」、「近東」、「東方」、「伊斯蘭」確實不是國族概念，而是情緒的符碼（emotional signifier），「五千年歷史」也好，「四千年」也罷，都是對「後」殖民主義的反動與回應；它沒有具體的內容，只是在徵召受創的主體能夠較有安全感的棲居在充滿了文化認同危機的世界裡。問題是這些所謂非西方的「大文明」，又再度陷入殖民主義的競爭邏輯，彼此搶奪「再現／代表」非西方／東方的位置。「文化中國」、「印度文明」、「中東古文化」在不同的操作空間裡，不是在排除他者嗎？環繞著「大」文明的「小主體性」（little subjectivities）又如何甘於自我邊緣化的命運呢？「南、北」區隔的出現，區域化的整合除了在政經層次以外，又何嘗不是精神分析的徵候呢？

那麼它們所共同面對的磁場核心「西方」呢？西方也是一個充滿了情緒的符號。更準確的說，「西方」所隱藏的是「白色」這個種族歧視的概念；它沒有任何的統一性，除了膚色之外。跟東方一樣，它充其量指涉的是所謂的文明；它的流動性具體指稱（signified）隨著霸權位置的取得而轉變：從荷蘭、西班牙到英、法殖民帝國，再轉到美國新帝國主義。「西方的沒落」、「廿一世紀是×××的世紀」不是投射

出「後殖民主義」的慾望嗎？

這裡，我無意簡化「文明主義者」的差異性，我們可以看到以杭廷頓所代表的右翼文明主義，部份企圖與國家機器相接合的新儒家式文明主義，以及 Nandy 的左翼人民主義式 (populist) 的文明主義。Nandy 的方案顯然是反霸權的，是非國家機器中心主義的；杭廷頓是帝國沒落的反撲焦慮，企圖能尋找與東歐文明的結盟關係；而新儒家在港、中、台、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已經成為國家機器積極推動跨國串連「共同」意識形態的核心論述 (Cho, 1995)，已經彷彿可以看到「大東亞共榮圈」的再生。這些反動的運作又能站在什麼基礎上批判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崛起呢？（新加坡作為城邦 (city-state) 以新儒家為國家意識形態，是小主體向文明主義靠攏的具體表現，雖然鞏固了其內部華人的安全感，但也深化了四大族群間潛在的張力。）可悲的是，文明主義與小主體又何嘗不是殖民主義的再延伸呢？

文明主義與小主體不是一組僵硬的 (fixed) 分析概念而是流動性很強的關係性組合，隨著主體所面對的對象而改變。殖民地對殖民母國經常投射出愛恨糾結的小主體情結，而對其它殖民地又捧出殖民母國文明主義所支撐的優越感。美國文化在面對西歐文明所展示的不安是小主體的表現，但是反過頭來又以歐陸文明發展極至者自居來面對世界；澳洲白人對英國文化近於情緒化的反彈，但是面對亞洲化政策又極度焦慮其歐陸文化傳統的逐漸喪失；香港一方面反感中英雙方的殖民式統治，另一方面又自豪是中西文明的滙集體……文明主義與小主體的形式、內容或有不同，但是都體現了文化上的歧視。

如果說殖民主義的基本文化基礎是種族歧視，它所造就的認同對象是施暴的殖民者，那麼新殖民主義的基礎則是認可差異性的多元文化主義（遮蓋了族群區分的主體），造就的認同對象是本土自我 (nativist self)。或許，真正去殖民運動完成的指標在於自我在高度自覺的意識下去內化它者，這裡的它者不再只是種族、族群的分類，也是階級、性／別，地理位置……所反射的層級化差異都需要透過理

解、互動，客觀條件的改變才可能逐漸地超越。¹²

殖民主義是一個強加的結構，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其實標識了殖民帝國主義啓航的里程碑，在四個世紀裡它全面性的改變了整個世界（Blaut, 1993）。殖民主義的政治認識論建築在嚴格的「內／外」之分，而區隔內外的主軸是種族（race）與族群（ethnicity）：膚色、語言、腔調、宗教……標識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區分，也標識出文化範疇的層級性及不均等的權力關係。性別、年齡、階級在殖民關係裡被轉喻化：殖民者是男性、成人、高等人士，被殖民者是女性、小孩、低級。去殖民運動深刻的認識到它不是殖民主義的翻轉，繼續維持殖民主義所強加的範疇，而是全面性地打破殖民思維與殖民範疇；它的政治認識論不再以種族、族群為優先，將性別、年齡、階級劃入種族、族群之內；認可差異性、改變差異性的層級化，進一步的內化差異性是它的政治倫理學。在這個意義下，去殖民運動是永恆的抗爭，對宰制關係的挑戰。

4. 批判性的混合：去殖民的主體性

4.1 認同焦慮

從以上殖民心理學到去殖民精神分析的論述空間裡，我們可以看到精神分析認同機制與政經結構的相互穿透，結構形式的轉變（從殖民到新殖民）也牽動精神結構重新面對不同的問題及認同對象。在不同的歷史—地理環境裡，由於文化範疇的層級性不同，物質條件的不同，壓迫強度的不同，也就會形塑出不同的精神架構及特定的運轉機制。從 Mannoni 一直到 Fanon 及 Nandy，他們的論述讓我們看到一連串變化的軌跡。在理論問題意識上，他們提供了部份當代文化認同危機的解釋。去殖民的動力對帝國主體造成了空前的震撼，殖民地的

12. 有關對多元文化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係，參見 Hage (1993)。內化他者的問題後詳。

撤離是自我的部份防衛機制；其內部去中心化運動造就了差異政治，也就是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正式上場，以後現代多元主體的形式出現；不同的認同位置提供了抗拒帝國主體的立足點，同時也對主體進行拉扯，多元認同之間的落差是文化認同危機的主幹。相對來說，被殖民主體也面臨下一波的置換，其「失所」（dislocation）的焦慮來自認同對象的快速轉換，去殖民本土化運動（nativism）使得原先對殖民者的認同已經不具正當性（政治、道德、心理……），而轉向對自我的認同，重新挖掘殖民前的自我；於是創造新的神話、英雄以達到自我肯定的安全感。然而潛意識的層次上，他／她對殖民強勢者的認同並沒有（也許也不可能）一刀切斷，自我的認可仍然需要他者來完成，即使是扯出龐大的文明主義，它還是在與西方白人文明的相對關係裡才會產生意義。重要的是創造神話、挖掘過去，營造文明的作用者，其自我的主體性已經不可能是白紙一張，從零開始，已經混雜了殖民語言的象徵秩序。這種主體分裂自我認知的焦慮是前殖民地地區在當下歷史情境中認同危機的基本性質。

解除主體多重分裂的焦慮如果只是期待認同符號的壯大（如國族一國家的「強盛」），並沒有處理到認同危機的核心：自我的再認識其實是解除危機的起點。如果我們把主體性當作雜種化（hybridization）的場域，只有經過對其向「外」投射的表現體（文化產品——小說、電影……的生產形式及內容），才可能認清主體性的構成；混雜性在這個意義下絕不只是種族的碰撞，來辨識其接合的形構；過去與現在的混合（封建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拉扯），地理空間的互動……這些不同文化因子不僅同時在主體身體上運轉，其間的相互接合更是異常的複雜¹³。再一次的強調，當代認同危機迫使我們認識到歷史的因子不是過去式，也是現在式；過去的傷痛雖然可以主觀地在記憶中被削除，但是它經常支配了現在的內容與形式，隨時在惡夢驚醒時重返現

13. 參見 Paul Willemsen (1995) 放在電影場域中重新看待主體性的分析。

在。

如果說上述的論證可以成立——當代文化認同危機是殖民主體在全球化壓力下的產物，強化了國族、族群……的身份認同，造成了主體的多重分裂——那麼能夠面對問題而又不落入保守反動、劃地自限的文化策略會是可能的嗎？

4.2 從「雜種」到「混合」

透過國家機器發動本土化運動、修改教科書……，如前所述是對殖民主義的反動，也因此持續了殖民統治由上而下的再次殖民，長久來說未必能夠面對文化認同危機的多重性：單一世界觀的建構必然是具有排他性的。在國族—全民的辭令下，邊緣主體群非常可能被排除在外。澳洲政府的多元文化主義策略實行廿年之後，仍然得面對原住民族群及非 Anglo-Celtic 群體無法成為接合主體的敵意（非法移民、外籍勞工諷刺地成為建構澳洲國族認同的他者）。「同化」（assimilation）作為殖民主義的想像已經在歷史上被證明為是具有壓迫性、無法實現的暴力運作。「四大族群」、「五族共和」都遮蓋了「同化」或是「和平共存」的作用者：誰向誰同化？原住民向漢人？為什麼不是漢人向原住民？誰又是劃出族群分類的主體？澳洲黎巴嫩籍的文化研究者 Ghassan Hage 一針見血的指出，多元文化主義的作用正是在主流強勢的 Anglo-Celtic 國族／共和論述中，將其他文化收集起來（collection）放入國族櫥窗中加以展示。「這種展示性的多元文化主義是後殖民視野裡的殖民主義豐年祭」（Hage: 1993:133）。（1994 年 10 月在紐約台北文化中心展出的原住民文化不是這種邏輯的體現嗎？）因此，Hage 認為多元文化政策「准許」其他族群「維持他們的文化」並不表示這不是一種全面控制的幻想。「多元文化的語言在這個層次上只是與動物學（zoology）語言並行」（p. 135）；如同動物學一樣，多元文化的語言系統對族群進行分類，構築層級化的秩序體系，在動物園中弱勢族群被展示成稀有動物，在多元文化博物館中被「想像成已經死

去的文化，不可能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除了以“和平共存”的辭令來規約、管制館中的收藏 (collection)」（p. 136）。Hage 強而有力的論辯：「如果說對“異國情調土著”的展示是殖民時期，在殖民地裡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核力關係的產物，那麼多元文化的展示則是後殖民時代裡移民過程發展在世界都會 (metropolis) 地區，後殖民權力擁有者與被後殖者之間核力關係的產物」（p. 133）。

Ghassan Hage 的洞見讓我們不能不質疑，國家機器、強勢集團、主流文化處理認同危機問題的結構性位置：不論其動機有多好，仍然會是另一種形式的歧視。多元文化主義的辭令中清楚的可以看到以種族及族群為劃分的主軸，其實承續了殖民主義的分割範疇，不僅遮蓋了它操作的接合主體，也顯示出在將族群中心化的過程，將階級、性／別……「文化」差異丟在論述邊界之外；因此，「多元」文化並不多元，「文化」的指涉也只是國家機器中心主義 (statism) 導向的國族及族群 (ethnic) 認同（詳見 Chen, 1995a）。

從「同化」到「和平共存」之後，後殖民理論裡提出了「雜種」(hybridity) 的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Homi Bhabha (1994) 從 Fanon 中發展出來的論述。在 Bhabha 手中，「雜種」不僅是描繪性概念，指涉殖民狀態中兩種不同文化的雜交效果；同時它也指涉抗拒的策略，特別是雜種化的效果：模糊 (ambivalence)。因此其論述層次不僅包括文化形式、殖民狀態、主體性、抵抗形式，甚至於倫理學層次的價值觀。

在〈Signs taken for wonders〉一文中，Bhabha 企圖重讀 1817 年五月在印度德里的殖民歷史記錄，透過雜種的觀念捕捉抗爭形式，對殖民體制的挑戰。承繼 Fanon 傳統對「認可」(recognition) 實踐中認同的重要意義，Bhabha 說：「殖民的混雜不是系譜學的問題，或是兩個不同文化間的認同，可以被當作文化相對論的問題來解決。雜種是殖民再現與個體化 (individuation) 的問題意識，它翻轉了殖民者渺視 (disavowal) 的效果，以致於其它“被否定”的知識進入了主

流強勢論述，遠離 (enstrange) 了其權威的基礎——這就是認可的規則。……雜種翻轉了渺視的形式／正式 (formal) 過程，因此殖民行徑的強烈移位成為殖民論述的條件」(p. 114)。把 Bhabha 經常使用的夾槓翻成白話文，我們可以這麼說，殖民狀態中的權力施展造就了雜種的效果，在這種效果裡並不是以往所理解的只有殖民者全面性的掌控，而被殖民者的文化傳統被徹底消音。其實被殖民者較統治者更為雜種，學會了強勢的語言 (英文)、腔調、表現形式……，雖然殖民者對他渺視，他仍然能以強勢者的語言將其被否定的知識、傳統帶入強勢論述空間，而殖民者由於對於這套文化符碼的陌生而不知所措，也就鬆動了他的權威；這種不安正是一種認可的表現。因此，雜種化的效果是模糊的，至少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在殖民再現體系內操作，繼續深化持續原有的關係架構，另一方面它又對殖民者進行“有禮貌”的對抗，縱使這種對抗不被殖民者所查覺。這套說法可以無限制的繼續推演，但是對本文而言重要的是認同與主體性的問題。

Bhabha 的論述形式基本上來自後結構主義的辭令。在「後殖民與後現代」一文中，他指出「後殖民的取向……企圖修正國族主義者及“本土主義者”的教導將第一世界及第三世界建構成二元對立的結構。後殖民取向抗拒宏觀形式的社會解釋。它強迫認可更為複雜的文化及政治界線，存在於經常是相對立的政治場域。也正是從這個文化價值的雜種位置——跨國的、也是翻譯性的 (translational) ——後殖民的知識份子〔包括他自己〕企圖發展歷史及文學的方案。我愈來愈認識到，在“殖民”文本內不同意義及價值的相碰撞及討價還價，官方政府論述及文化實踐等都預期了許多當代文化理論中的問題意識——遲疑、模糊、無法決定性、論述圓囿 (colsure) 的問題、對作用者的威脅、動機的身份位置、對全面化概念的挑戰……」(p. 173)。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Bhabha 的發言位置：移民後裔、跨國、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精神分析……在他身上體現，殖民主義在不斷的流散 (disseminate) 過程中變的一切都无法決定：是的，但是……對

於 Bhabha 的批評, Young (1990:141-156) 已經提了很多,這裡不再重複,只提出兩點。首先, Bhabha 透過後結構主義的眼睛重看殖民片刻,却徹底地將分析對象去歷史化,所有的殖民狀態都是一樣的嗎? 從 1817 年一直到現在仍然如此? 從 Mannoni、Fanon 到 Nandy 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問題意識都在面對不同的歷史環境: 殖民地、獨立前、獨立後認同機制的轉變……第二,「雜種」做為分析概念如果在不同層次操作,而沒有清楚的理論定位,也就喪失了它的作用(同樣的像 mimicry 被視為描繪性概念,演伸自雜種,同時又變成抗爭策略)。特別是這個概念本身暗示了先前的理論概念「純種」;兩種「純」文化相碰撞產生了雜種,那麼未經「污染」「原來的」文化難道不是已經在歷史軌跡中混雜了多元「外來」因子嗎? Paul Gilroy (1994: 54-55) 就指出,「雜種預設兩個先前的純種……我不認為有所謂的純種,或是先前的純種……文化生產並不像攪扮雞尾酒……所以我試著不用“雜種”這個字,因為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混合 (mixes)」。Gilroy 提出另一個概念:「人們現在稱之為雜種,我以往稱之為 syncretism [混合]。我想我寧可繼續使用它——混合是常態,雖然這個枯燥的人類學字眼不具詩義。沒有東西是純種的。為什麼的誰要純種? 一旦純種被提出,我就會懷疑」(p. 54)。

其實「混合」並非只是人類學所使用的概念,用來描繪人種互動中的過程,宗教及思想史的研究中,「混合」亦是重要的分析性概念。錢新祖 (Chien 1986) 在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一書中,即以此概念來說明晚明時期,一種不同於以往地混合意識的出現,焦竑混合了佛教及道教的因子,來與程/朱的教條對抗。在焦竑的思想模式中,儒、道、佛三教之間不再只是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而是「交互混合」(intermix, p. 15),相互解釋、啟發 (p. 14)。在理論層次上,錢新祖改變了 Helmer Ringgren 及 Ake Hultkrantz 對「混合」的用法,對他來說「混合」不僅強調的是混合 (mixing) 的過程,同時是一種積極的意識,為這

個過程提供辯解 (p. 2)。因此，在錢新祖的手中，「混合」暗示了主體在參予互動過程中的主動積極性，主體的實踐不是在加強的、無意識的狀態中進行，而是經過思辯、反思的與它者進行辯證性的互動。

這裡我要借用錢新祖提出的「混合」觀念，放在去殖民倫理學的場域／層次上，做為突破殖民認同的另類文化想像，稱之為批判性的混合。這裡的關鍵問題是主體的認同對象：被殖民者主體性的形成一直是被動、被強加的，其認同對象是強勢的殖民者；去殖民過程中的本土化運動及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將認同對象轉為「自我」，依然是對殖民者的反動，以多元文化及多元主體的形式出現；而徹底掙脫殖民認同的框架就不可能停留在劃地自限的自我認同，必需走出自我，找尋多元的認同對象。問題即在於對象是什麼？如果「批判性」混合預設了具體的主體位置，站在左翼的觀點，其慾望投射的認同對象又會是什麼？

4.3 「批判性混合」

批判性混合的基本倫理學原則就是「成為它者」(becoming others)，將被殖民者的自我／主體內化為（弱勢而非強勢的）它者，內化女性、原住民、同性戀、雙性戀、動物、窮人、黑人、非洲人……將不同的文化因子混入主體性之中，跨越體制所切割的認同位置及邊界，消除階級、父權、異性戀、種族沙文體制所強加的「殖民」核心關係。因此，批判性混合是被殖民弱勢主體之間的文化認同策略。

誠如 Said 所說，「帝國主義以全球性的規模下強化了文化及認同間的混合 (mixture)。但是帝國主義所帶來最壞、最矛盾的“禮物”就是讓人們相信他們只能是白人、黑人或是西方人；或是東方人」

(1993:336)。殖民帝國主義造就了無法重返的「混合主體性」；如果我們接受 Gilroy 的說法——純種從不存在，它只是另一種神化，另一種法西斯式的暴力——那麼帝國主義所造就的結構性全球化趨勢更深化了「混合主體性」的更為混合。資本的流動、人的流動、文化間的流

動……無法抗拒。面對全球化的壓力，首當其衝就是國族認同，人的碰撞、互動中國族認同被召喚成主要認同（你是那國人？在×國要待多久？什麼時候回國？）；全球性官僚體制（global bureaucracy）也將國族—國家建構成基本統治單位（護照、身份證成為認同的基本構成）。Hall（1992）在「文化認同之問題」一文中，指出全球化所造成之相互矛盾的效果：

1.持續的文化同質性及“全球性後現代”造成了國族認同的被打破。

2.對於全球化的抗拒，使得國族、其他“在地”或是特定的認同正在被強化當中。

3.國族認同在式微，而新的雜種認同正在取得他們的位置。（Hall, 1992:300）

Hall 所指出的命題 1.確實在發生，傳統所謂主權／領土的完整已經受到資本、資訊、人口流動的衝擊；但同時命題 2.也在發生，新一波全球性的國族主義崛起部份是對全球化，特別是資本的反動。Constantino（1988）指出，戰後的去殖民運動立刻被轉化成經濟層次的新殖民，「它的組成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跨國企業對前殖民地的經濟宰制。國族主義主要的觀念仍然主要是獨立，但是今天的重點是經濟獨立」（p. 22）。很明顯地對他言之，第三世界今日的國族主義是防衛性的，是對資本全球化掌控的反彈；但是他也同時指出「國族主義應該逐漸延伸至更廣更深的社會抗爭，取消所有剝削的形式」（p. 23）。所有剝削的剷除則指向 Hall 的第 3 命題，即新認同的產生，新興社會運動的認同政治是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新移民群體的出現使得族群因子面臨改變（英國戰後黑人移民的出現改寫了“英格蘭人”的意義¹⁴）。

重要的是，擺回去殖民運動的歷史走向裡，要閃躲 1)殖民時期對強勢殖民者的認同，2)本土化運動自戀式的主體分裂危機，不再複製以

14. 詳見 Hall（1996b）。

往的殖民式權力關係，那麼理想去殖民／後殖民認同的對象又是什麼？那樣的主體性又會是什麼樣子？在性／別軸線上，一旦放棄父權異性戀的“常規”，同性、雙性、泛性（trans-sexual）社群彼此之間已無界限；在族群軸線上，一旦揚棄種族（漢人）沙文主義，走向原住民、擁抱黑人，族群界線則可能被打破；在階級軸線上，一旦能放棄資本、資源的壟斷，使得社會資源得以重新有效分配，貧窮就可能消失……因此，「成為它者」的它者絕不再是向「上」認同，企圖成為強者，而是與弱勢者認同，是弱勢者之間的相互認同。在這種原則下，統／獨都只是國家機器層次之間的問題，結果如何新興主體都還得面對大／小國家機器所處的結構性位置。

這種批判性混合主體的提出有點像是癡人說夢。殖民主義史諷刺地證明了主體變動的可能性；不同的在於從被動、強迫到基極主動地將認同對象多元移轉。20年前搖滾歌手 John Lenon 的 Imagine 不就提出了這種藍圖。與雜種不同之處在於，批判性混合主體不描繪客觀狀況，而是有意識、自覺的、經過反思地去接近、內化她者。Said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的結論中也提出了他的想像：「今天沒有人只是一種東西。像印度人，女人，回教人士，或是美國人之類的標籤都不過只是一些起點，假如根據真實經驗，就立刻會被留在身後……就像人們創造她們自己的歷史一樣，她們也創造她們的文化及族群認同。沒有人能否定長期傳統、持續居留、國族語言及文化地理的連續性，但是也似乎沒有理由（除了懼怕與偏見）不斷地堅持她們的分離與特殊性，好像所有的生命就應該是這樣的。生存事實上是事物間的連結……更有回饋價值的一也更難的一是具體地、同情地、來回地思考她者，而不是只想到“我們自己”。這也意味著不要企圖去統治別人，不要對她們任意分類，放入層級次序，更重要的不要不斷重申“我們的”文化或國家是第一名（甚至說不是第一名）。對知識分子而言，不這樣做就已經有足夠的價值了」（Said, 1993:336）。

「批判性混合」以文化主體性的再認識為起點，必須透過具體多

層次的實踐才能成為它者。而實踐的著力點不僅在於挖崛社會「內部」被壓抑掉多元主體的聲音，也在開發「外在」資訊的流通管道，才能在文化上建立更為多元的參考架構。反省起來，台灣社會在國家機器的主導下，媒體、教育所開啓的文化資源及資訊幾乎全然來自美日的主流文化；除了好萊塢，CNN、麥當勞之外，就連學院的「外」語系所指的也主要是「美」語（儘管如此，美國的非主流文化如黑人、原住民……也不曾成為文化想像的因子），對於美語之外的非洲、東歐、北歐、拉丁美洲、南亞、東南亞更是毫無認識。理、工學科想要變成「亞洲的MIT」，社會人文學科的分析架構也是美國學院主流的翻版，自稱另類進步的學術社群（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也未能以第三世界左翼學術生產為對話對象、參考作標¹⁵。這些現象的發生都不是自然的，再再顯示了新殖民主義所架構出的流動軌跡及其自我再生產。

因此，「成為她者」的批判性混合主體性不僅是倫理學的原則，也是變動（「成為」）的主體位置，在文化想像的層次上提供慾望投注及認同的對象，有意識地檢視、防阻複製廣泛殖民主義地擴大與深化，避免惡性循環的自我再生，因此它是反霸權的去殖民方案中的環結。

5. 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

5.1 文化研究的再定位

國際性文化研究的歷史形構肇始於戰後全球性的去殖民運動。它的思想資源可以回溯到帝國內部去殖民的力量——馬克斯主義，而其立即的歷史經驗庫存則來自於殖民地長期反殖民運動的洪流。英國新左派在 1950 年代形成的重要因子是兩股去殖民力量的混合：以 E.P.

15. 從這個觀點來看，中研院的東南亞研究計劃如果不是只為了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複製區域研究的問題，或是會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如果以功利主義式的運作模式，很可能像東亞所一樣，淪為「匪情中心」。

Thompson 及 Raymond Williams 為代表英共的異議份子，與 S. Hall, Charles Thaylor 為代表來自加勒比海與英國殖民地知識份子，在 1956 年蘇聯入侵布達佩斯，英國入侵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相互結合；兩者在當時政治社會的空間裡都處於邊緣／外圍的位置，對於帝國主義進行批判。特別是後者，因為是「外人」無法打入左翼主流政治社會，也因此沒有被吸入國家主義的政黨（工黨）運作；他們所帶來的「外在性」歷史殖民經驗更提供了社會批判的資源，在冷戰形成過程中取得了道德上的發言位置¹⁶。因此，沒有殖民地知識份子就極可能無法滙聚成為新左派，而“英國”文化研究的新左傳承也就可能非常的不同。如果我們無法將文化研究抽離其形成的歷史環境來理解，那麼不僅文化研究的“英國”屬性不但要被去中心化，甚至可以進一步的推演：文化研究在其生成期就已經存在了國際（主義）的因子；它的歷史方案即是去殖民運動。

事實上，在過去卅年的歷史實踐裡，文化研究不但繼承了這個批判傳統，也成為持續去殖民運動的重要力量，其論述與研究與社會運動維持了多多少少的互動關係，它的關切焦點，認識論典範的移轉都是與女性主義，同志運動、少數族群……互動的結果；也是因為它與歷史社會現實緊密接合，文化研究才能保持它的活力，並沒有像一般學院流行論述在成為風潮後逐漸死去。或許也正是這些原因多元決定了文化研究這個符碼開始在 80 年代中期後在許多地理空間裡召喚了諸多的在地知識份子，逐漸的走向「國際化」的道路。從文化研究的外部來看，國際化也是回應於後冷戰時期資本的快速跨國化，全球資本主義結構性的轉變也造成了國族—國家尋求區域切割的結盟；同時接踵而來資訊硬體設施的搭建……等種種軸線的力量迫使文化研究者（重新）認識到在地文化形構無法關起門來理解，文化生產一方面必需連結到區域乃至全球生產／流通機制（〈喜宴〉、KTV、香港電影工

16. 詳見 Morley and Chen (1996)，及 Hall (1996b)

業、Star TV……都是例子)，另一方面在地史也必需連接到它與殖民史的辯證關係上。

這種再認知也讓文化研究質疑其以往的分析架構——過餘平面、鎖碎、必需回到歷史，殖民史、帝國主義史，重新理解在地、國家文化的形成，才能更準確的劃出文化形構的歷史軌跡。而後冷戰時期的到來也提供了從文化政治的角度重訪殖民帝國主義史的可能性：或許戰後四、五十年的「心理／精神」鎮痛已經有了喘息的機會，重新有距離的去觸碰殖民帝國在文化想像空間裡對主體所造成的長期銘印。這個方案的走向，如前所述，當然是在再深化去殖民運動的動力。

相對於其他學院的傳統，文化研究並沒有成為帝國主義、內部殖民主義的幫凶；出自於去殖民運動的傳統，它在認識論層次上從未將“理論”視為一組普同性的形式命題來強加在分析客體上，而強調理論是發生於與現實狀況互動產生的分析工具，因此相信歷史的偶然性及在地的特殊性，使得分析取得了較大的彈性空間。

如果將文化研究定位為全球性去殖民運動的一部份，那麼透過比較研究重新理解在地文化形構絕不是任何單一研究者可以完成的，而需要更多的合作。問題是既有的認識論並沒有發展出敏銳的歷史、地理架構讓我們重新認識殖民帝國史。文化研究過去發展的分析概念因其所屬的地緣政治核心位置也不能直接挪用來面對其他的地理、區域空間及歷史。因此，作為文化研究者必需找尋其他的理論資源，重新建構新的分析架構來面對“我們”的問題。從這個視點來看，本文是初步的探索，企圖從 Fanon 到 Nandy，從 Hall 到 Said，拉出文化研究傳統另一條思線路線，開始建構文化想像的地理學。我對他們的理理解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批判性的理解，思想／理論受限於它生成的時空脈絡，在不斷找尋、修正的過程裡，或許能夠產生較為貼切的、更具彈性、比較性分析架構及問題意識。

5.2 歷史唯物論的去殖民

作為去殖民方案的延續，瞄準「文化想像」的場域，「殖民—地理—歷史的唯物論」的提出是回應於後殖民論述浪潮裡文化研究面臨「國際化」壓力而找尋新方向的產物。它預設的是資本全球化是殖民主義的延伸；要理解／解構當代文化形構及主體性的構成，必需回到殖民史在特定時／空中的操作所帶來的長期效果；而效果的內容與形成是特定地理空間在既有的歷史形構與殖民史相互碰撞的結果，因此它所指涉的地理空間不僅是前殖民地，也是帝國基地。在掌握特定地理空間經殖民史的重構所形成的文化造形後，經過比較研究，當代文化想像的地形圖或許可以被更精準的畫出。

歷史唯物論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高潮點時提出，確實造成對傳統政治經濟的轉化，將其由平面拉向歷史的縱身，確定了許多分析／論述必需被「歷史化」的認識論原則。然而其歷史的書寫却被擺在歐陸中心的環結裡企圖將世界史納入單一的線性歷史模型，並未去除歐洲中心主義的包袱。直到二次戰後去殖民運動高潮裡，基進地理學以期刊 *Antipode* 為基地開始發展而逐漸長成「地理—歷史唯物論」，至八〇年代後期才漸趨成熟。

地理學的唯物論其實發展甚早。根據 Karl A. Wittfogel (1929; 1985) 在一九二〇年代發表的重要文章，〈地緣政治，地理學的唯物論及馬克斯主義〉，早期德國傳統的地理學唯物論主要的問題意識是在處理自然—環境、生態、資源、地形—與人類社會的關係；更具體的來說，擺在歷史唯物論的架構裡，要問的問題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因素最終決定了歷史的發展？透過對地緣政治學家 (geopolitician) Ferdinand Richthofen, Friedrich Ratzel, Rudolf Kjellen, Karl Haushoffer, Georg Engelbert Graf 的論述，及地理唯物論者 Montesquieu, 黑格爾, Karl Ritter 乃至於康德的批判，Wittfogel 企圖將自然因素納入歷史唯物論的體系，而捨棄地理唯物論。Wittfogel 的核心論點是在生產過程中，「勞動是積極的過程，中介了人與自然」(Peet, 1985)，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歷史唯物論的關鍵，透過這層

中介才能理解生產模式，亦即生產模式中已經暗示了自然因素。因此對他而言，地理唯物論根本上問錯了問題，自然與社會事實上存在了辯證關係，從馬克斯的辯證唯物論的立場可以回答歷史的推動力量（driving force）何在。如果說地理唯物論認為歷史單面向地為自然所決定，那麼它的敵人也單面地的排除自然因素，認為歷史是社會的產物。重新提醒馬克斯的名言——人類創造歷史，但是是在既有的條件中創造——Wittfogel 如此論辯：「如果說生產力量的總體決定了特定歷史時刻中生產模式的特性，那麼其實是社會面向（作為積極主動的作用者）決定了改變，自然所限制的作用者決定了改變是否可能，以及其變動的方向。縱使人將自然為其所用，他也因此將自己臣服於自然，並且跟隨著她」（p. 55）。

在 Wittfogel 的具體分析裡，他企圖將馬克斯的「亞細亞生產模式」細緻化¹⁷，於是因自然環境不同而有次級分類：埃及型、日本型、印度型……。問題是他比較的參照「理念型」却隱而不見——歐陸生產模式。這也正是潛意識歐洲中心主義之所在。另外區域史中，「埃及」、「印度」、「中國」……在歷史中所造成的區域性影響，對臨近地區在政治、文化、主體性的形塑並未進入他的分析領域裡。Wittfogel 的論述受限於當時的知識邊界（epistème），只有在下一波的歷史運動中才能打開原有限制。

5.3 空間／地理唯物論

如果說早期的地理唯物論將「地理」主要理解為「自然」，那麼下一波認識論的斷裂，或許至少是重點的移轉，則是基進地理學所提出的「空間」概念（包含了「自然」）。

Soja 及 Hadjinichalis (1985)，一九七九年在 *Antipode* 發表的

17. 根據 Peet (1985)，Wittfogel 1926 年的著作 *Awakening China*，中國特有的自然地理環境成為他將亞細亞生產模式細緻化的場域。對於 Wittfogel 深入的批判，參見 O'Leavy (1989)。

「在地理唯物論與空間拜物論之間：馬克斯主義空間分析的發展」一文中，最為清楚的觀察到空間理論逐漸取得重要認識論的位置¹⁸。從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企圖重新強調在馬克斯主義傳統被忽略，甚至像 Wittfogel 所“檢查掉”(censored)的地理唯物論，亦即歷史唯物論如果沒有空間／地理唯物論，是不完整的；地理相對於歷史就像空間相對於時間一樣，很難將它們分離。而空間意識的逐漸出現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回應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他們列舉了都市空間的組織，區域主義的政治，環保運動，國家角色在社會空間的擴張，相互連結國際經濟體系的形成，以及相對應論述主題環繞著都會政治經濟學，都市社會運動，都會規劃的意識形態，區域發展，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一邊陲關係，資本在特定地理區位的集中，以及國家（領土）獨立運動。這些論述的產生逐漸形成所謂的「空間問題意識」。已經超越了傳統地理唯物論中的「自然」觀念。

爲了建構理論上的正當性，他們將空間問題意識以馬克斯主義傳統的語言來呈現：「根本上，人類的空間性必需被視爲一種社會產品（product），如同其他的社會形式（如階級結構）一樣，被根本的生產關係所製造並且結構化。空間的生產，亦即人文地理學最完整的表現，是奠基於生產模式，被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再生產與轉變之間的矛盾所形塑……所有的生產模式會生產其自己的空間，更準確的說，在特定的社會形構中，社會性組織的空間變得特殊化及具體化」（p. 60）。以 Henri Lefebvre 爲理論的先鋒，因其將空間問題意識提昇到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位置，Soja 及 Hadjinichalis 認爲核心問題在於再生產的問題：1)生物性（家庭），2)勞動力及生產工具，3)生產關係。如同阿圖塞對「意識形態」的作用一樣，空間的再生產維繫了主宰性的社會關係。

再陳述了空間問題意識之後，他們企圖解釋在西方馬克斯主義傳

18. 該文於1985年重印於 *Antipode* 專號「The Best of Antipode, 1969-1985」；該文部份又重寫於 Soja (1989)《後現代地理學》的1.2章。

統中為何空間分析一直被忽略，然後又企圖重新劃出片段斷斷續續的系譜，一直連繫到 Lefebvre 六〇年代後期及 Manuel Castells 七〇年代初期的理論論述，如 1917 至 1925 年蘇聯的都市規劃者、地理學家、建築師所發展的“新社會主義的空間組織”；1920 年代葛蘭西所處理的都會及區域問題；這個傳統在 1960 年代由 Lefebvre 全面展開，特別是集中在都會脈絡（「Ledrut, Castells, Lojkine, Topalov, Preteceille」），而後擴散至美國（David Harvey）。除了 urban 議題外，又連繫到 1) 區域問題，2) 世界體系理論（「Amin, Wallerstein, Frank, Palloix」），特別是核心及邊陲地區資本主義發展的差異。

最後，Soja 及 Hadjinichalis 指出馬克斯主義空間分析必需被克服的分野：1) 在資本主義先進地區，都會 v.s. 區域的分野，2) 核心 v.s. 邊陲的不同強調，3) 空間問題是對歷史唯物論的重要貢獻（即是可以被納入其中）v.s. 空間與資本對勞動力剝削有相同的理論層次位置（即有相對自主性）。因此「地理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有辯證連結的基礎（p. 65）。（其實，Wittfogel 代表了後者，而 Lefebvre 代表了前者）。第三個矛盾／分野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有了轉機。根據 Soja（1989）在《後現代地理學：批判社會理論中空間的再重申》的第二章，早期遲疑的馬派地理學家如 Harvey，甚至包括社會學家 Castells 也舒緩了弑父情結不再強力反對 Lefebvre 所造成的「空間拜物教」¹⁹，共同開始建構更具開展性、解釋性的「歷史—地理唯物論」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Soja 認為「這是一個較之前號召空間化都會政治經濟學更為基進的方案」（1989:70）；也就是說時間／空間的辯證唯物論較都會政治經濟學更為根本、更具包容性、抽象層次更高。至於 Soja 本身企圖將馬克斯主義地理學「後現代化」以彌平地理學的紛爭／內鬥，則不是本文所關切的（Soja 的號召顯然是受到美國學院主流氣氛的影響——八〇年代中期後現代風橫掃

19. 根據 Soja & Hadjinichalis (1985:61), Castells 是 Lefebvre 的學生。

學院的結果)。重要的是他替本文劃出了一條重要的支幹。

雖然 Soja 在理論問題意識上強調時間與空間等同的重要性，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却對空間全然的執著：「後現代」地理學削短了歷史意識，整本書發展的都是空間問題。這種論述效果當然可以被讀成是對「歷史」唯物論長期掌握霸權的反動，或著是學科本位（地理學）割分理論地盤的欲望。無論如何，「歷史—地理唯物論」在論述效果上確實造成了歷史唯物論的去中心化；將「空間化」切入歷史唯物論就是在掃除它的歐洲中心主義，認識論層次的歷史化面臨再一次的空間化命運：例如所謂亞細亞生產模式不能再以歐陸生產模式為分析的基礎，或是對映理念型，而必需由地理空間的時空內在性來解剖，問題不再是「中國生產模式」為什麼不能有真正（歐洲式）資本主義的產生？而是中國內在的歷史—空間形構如何產生它的生產模式？在與世界經濟體系接合時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在閉關 40 年的 de-linking 時代後，與全球資本主義相互碰撞／接合又將產生什麼樣形式的改變？重要的是「空間化」不能從歐洲中心主義轉向美國中心主義，Soja 的「後現代化」「L.A.」不具有這種未經問題化（problematize）的潛意識指涉嗎？後現代地理學會發生在 Cambodia, Burma 嗎？如果「歷史—地理唯物論」仍在複製歷史唯物論的單一化、潛意識地緣中心主義，那麼就喪失了它所聲稱的基進批判性。

5.4 「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的草案

時間／空間的去中心／去殖民認識論，並不必然導致支離、破碎、喪失結構性的後現代／後結構主義命運；它的統合性基礎是資本全球化運動，也就是殖民帝國主義的結果，也正是在對映的認識論層次上，下面將整合「歷史—地理唯物論」與先前理論推演所企圖建構的「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在時間、空間去中心化後，我們把焦點座標指向殖民問題，亦即核力關係中的多重宰制。

在前面的論述裡，我們已經一再強調「全球化」是 1492 年以後殖

民帝國主義逐步吞食全球的結果；換句話說在五個世紀的漫長過程裡，殖民主義全面性的改變了原先相對分離地理空間的文化型構。要瞭解任何地理空間的文化構成就必須關照到殖民主義如何與在地歷史相互接合，在互動過程中轉變了既有的文化形式、構造、地型；殖民主義不僅在殖民地運作，也改變了帝國“內”的文化想像結構。因此，將「殖民」(colonial, colonization) 上昇至「歷史」唯物論及「歷史—地理」唯物論平行位置的作用在於 1. 將整個認識論方案徹底政治化，2. 將歷史唯物論更基進地去除歐美中心主義的潛意識，甚至「說出」歷史—地理唯物論建構主體位置「說不出」的外在觀點，3. 在承認殖民資本主義統合性力量的同時，仍然強調「歷史」—「地理」的特定性 (specificities)。簡單的說，1492 年以後文化想像的結構在特定時／空中的長相是「殖民」、「歷史」、「地理」辯證接合的結果。

根據 Blaut (1993) 極具說服性的論證，1492 年之前資本主義在亞、非、歐洲的部分地區已經逐漸成形(他稱之為 proto-capitalism)，在當時絕對無法預料資本主義會在歐洲取得領先位置 (p. 179)。1492 年之後資本主義逐漸興起，其「總部」出現在歐洲 (20 世紀後轉向美洲大陸) 的主要原因是歐洲由於地緣位置的接近性，“發現”、攻佔了美洲大陸，加速了它的資本積累，累積了爾後向各地擴張的物質基礎 (p. 180)。1688 年英格蘭的「光榮革命」後，資產階級奪權，象徵性地宣示封建地主階級的戰敗，商業資本主義取得發展優勢。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再度標示出下一階段的轉進，徹底改變生產工具及生產關係，加速了資本積累，將殖民帝國主義帶向高峯。Blaut 的分析導致這樣的總結：「資本主義以世界性規模的過程崛起：成為一個世界體系。資本主義之所以會以歐洲為中心乃是因為殖民主義給予歐洲人龐大的力量，讓他們發展他們自己的社會，也防止其他地區的發展。正是這個發展與落後發展的機制才能解釋現代世界」(p. 206)。Blaut 的政治經濟地理學分析在掃除歐洲中心主義「擴散論」(diffusionism) 的迷思，但是將焦距拉長至五個世紀之前，讓我們更為清楚的看到殖

民主義生成的歷史軌跡及資本主義總部的移轉對「全球文化」銘刻的潛在力量（經濟力與文化形構之間沒有必然的絕對關係，但是文化的介入有其必然的物質基礎）。

如果將焦距拉的更進一點，根據 Magdoff (1978)，工業革命之後，至 1800 年為止，歐洲殖民主義有效佔據了地球 35% 的土地；至 1878 年，躍昇至 67% (p. 29)；1914 年，則高達 85% (p. 36; Said, 1993:8)。很明顯的十九世紀是殖民帝國主義擴張的高潮，它將原先不同的世界逐漸推向「一個世界」。二次戰後，殖民帝國在十年間快速瓦解，直到今天保守史家仍然無法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²⁰：何以五個世紀的經營會在如此短暫的過程中快速的解體？其中的一種解釋就是：除非是接受實證—形式主義的說法，帝國主義其實並沒有瓦解，直接領土的掌控轉化成政治、經濟的直接、間接的控制。也正是 Fanon 在 1961 年就已經指出的「新殖民主義」(Fanon, 1968:152)²¹。不論是殖民主義或是新殖民主義，至一次大戰時，世界上至少 85% 的地表已經在殖民主義籠罩之下，受到它暴力性的洗禮；直至今日，如 Said 所言，殖民帝國主義仍然在文化上施展它的力量。因此，要瞭解當代文化形構，殖民主義是必然的中介過程。

而殖民主義的實際操作是透過文化想像的中介；文化想像的內容與形式一方面來自於殖民認同（縱使是去殖民過程中的「不認同」(dis-identification))，在與殖民者的文化碰撞過程中的歷史經驗成為想像的資源，在另一方面則填塞了精神分析空間，成為形塑被殖民主體的基本材料。文化想像的指稱究竟是什麼？與「意識形態」又有什麼差異？

5.4.1 「文化想像」

20. 參見 Fieldhouse (1982:395-428)。

21. 新殖民主義在文化上的操作，參見 Goladwin & Saidin (1980:63-130) 及 Goonatilake (1982:100-129)。

在一個層次上，「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可以被視為 Said「文化及帝國主義」的深化或是場域／空間的移轉。在〈帝國，地理與文化〉一章中，Said 清楚的指出，他企圖分析是帝國主義所造就的整套「文化形式及其所生產出來的感覺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 ……在許多種宰制及對其回應中，“西方的”及其所引發的反抗」(p. 10) 是他在該書中要處理的主體。這裡他稱之為文化形式及感覺結構正是部份我企圖展開的空間，統稱之為「文化想像」。文化影像是殖民主義與在地歷史文化資源碰撞的結果，不僅是形式也是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透過作用者的論述接合，散放 (disseminate) 至不同的場域，形塑了殖民／被殖民主體的想像空間；作為一種 popular epistème，文化想像結構了意識形態的系統，與具體生活經驗結合，架構了“精神分析空間”感覺的方向與邊界。它的論述性不僅滲透一般主體 (popular subject)，官方論述，反殖民論述，就連貌似中立／超然的學術論述也難逃其間。“西方 v.s. 東方”即是殖民交戰的結果，成為文化想像支配性的認識範疇，就連社會科學的學術語言都要不斷的徵召這類的字眼，縱使“西方／東方”沒有具體指稱，或者指的是特定的主體（舉例如來，歐洲法國十九世紀巴黎殖民政權派駐×地的總督）。

文化想像在理論層次的定位與阿圖塞傳統界定下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潛意識的再現系統）交插重疊；而不同的是阿圖塞企圖建構一個普遍性的理論來連結主體與其生活世界的關係，「文化想像」則指涉了文化性的自我對「異文化」它者的想像性認知，並在對照過程中認識自我。

這些整組不必然具有一致性的文化想像，因不同種文化的殖民主義，在不同的地理—歷史環境中操作，所以會有不同而又有變動性的內容與形式；其中部份的因子在長期沈澱中已經形成牢不可破的潛意識“常識”（葛蘭西）。去殖民文化研究的工作即是在掌握特定文化想像的常識，追溯／解構殖民常識的迷思。由於文化想像透過不同的文

化機器（教育、媒體、文學、乃至於科學知識的生產²²……）多重散放，它的具體表現也可以回到這些場域中來“捕捉”。最近極為流行的殖民旅遊書寫即是殖民文化想像較易捕捉的運作空間（主體與他者直接的碰撞中所投射的主體性造形）。以去殖民問題意識為出發點所進行的揭露工作，或許可以展開／看到不同的剖面。殖民認同是切入文化想像空間的主軸，是起點不是終點；也就是在這裡歷史—地理唯物論可以被接合到 Fanon 以降的（去）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的論述傳統中。

5.4.2 文化想像與殖民認同

在「帝國之眼」一文中，我曾經嘗試引用 Fanon 的理論解釋台灣「南進論述」中所投射的殖民認同²³。在分析過程中我發現到 Fanon 模式裡，殖民者／被殖民者、黑／白、男／女清楚的對立在「台灣」的文化想像裡是較為間接、隱晦的；例如法國殖民主義從未直接對台灣的地理空間進行侵略，然而也能成為認可／認同的對象，顯示出「法國」的文化／文明在文化想像中佔有層級範疇上較「高」的位階；會突出選擇「法國」為認同對象不是偶然的，顯然它不能完全置換「西方」，亦即「西方—白色」的範疇也具有「內部」的層級化。「法國」為什麼會，在什麼時候起，盤據了文化想像中的位置需要被追問。反倒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殖民認同中可以較清楚的看到法農式的對立；但是儘管如此，黑女人 v.s. 白男人與本省女人 v.s. 外省男人之間出現了強度上的差異，至少 Fanon 所畫出的圖像中沒有黑女人能夠騎在白男人「上面」以達到出頭天的效果。這是否意味著種族與族群上的權力強度差異？我要指出的是，在具體分析裡我發現到殖民認同需要更為後設的擺到歷史—地理時空中來看待，在時間及空間不同的比較後，或許更能掌握殖民認同的特定性（specificity）。所以說透過殖民認同為切入點，可以拉出文化想像更為長遠的形構，其中的層

22. 參見李尚仁 (Li, 1995) 對熱帶醫學的形成與英國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共生關係的分析。

23. 參見陳光興 (1994)，特別是 178-187。

級化建構，那些詞項（如英美法而不是烏干達，斯里蘭卡）能夠進入其間，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成為國族文化想像的視野……這些都是要被追問的問題。

文化想像內容／形式的特定性及差異性並不能否認 Fanon 所提出的問題意識：殖民認同的產生及邏輯在抽象層次上似乎又具有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可以解釋為什麼被殖民地地區之間在所謂後殖民時代，彼此之間沒有連線，主體互動沒能發生。也就是說，殖民者撤守之後，被殖民者並沒有切斷對它的認同，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仍然持續著親密關係（法屬非洲及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在獨立後，巴黎依舊是認同投射的對象），或是由其他強權“託管”，延續了殖民關係。這些實質上的殖民認同關係展現在制度性的規劃，規範了文化想像的邊界及內容。所謂「西化」、「美國化」的意義就在於此，「認同」的意義不是「等同」、「一致」，而是部份、片面的模仿、學習認同對象的社會運作模式，以對象所提供的模型來自我丈量。

殖民認同的範疇、機制、對象是幾個世紀中建構起來的，它在文化想像中的沈澱效果不可能在經暴露後立即消失，所以前面已經說過這只會是起點而非終點，需要不斷的被討論、再思索，甚至逐漸進入主流文化想像空間，打破僵硬軸線。去殖民文化研究的歷史任務可能就在這裡。在「全球化」流向中，資本主義「總部」或是「次總部」的移轉，事實上提供了客觀形勢，讓眼睛調整視角看到原來看不到的地方。從這個角度來看，「南進論述」是全球資本重心轉向的結果。問題是要如何面對「出頭天情結」（triumphalism）所召喚的次帝國主義慾望，只改變了殖民認同的對象，但同時繼續深化殖民關係。

5.5 「台灣」

回到「台灣」。做為一個地理空間，台灣可以說是帝國主義在亞洲的縮影；台灣當代的文化形構不能「關起來」分析，必需放回區域史及帝國主義發展史中來看待。台灣文化的複雜性較其他殖民地來得更

爲「混合」。如果說菲律賓經過四次的「解放」，那麼從原住民的主體位置來看，原住民台灣被殖民者「解放」的次數可能多了一倍：從漢人入侵、葡萄牙、荷蘭、明鄭、清朝、日據、「中國」國民黨／美國、「台灣」國民黨，一直到仍然處於膠濁狀態的統獨問題。然而，原住民運動及問題在前殖民地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正如火如荼的展開，對白人移居者（settlers）的文化認同造成空前的衝撞；相對來說，台灣原住民都尚未視到應有的正視，漢人也從未正視自己是移居者。因此，要瞭解完整的殖民認同系譜，就必需將殖民史一層一層重新地翻開找尋殖民文化的銘印及政權轉換的糾結關係。第三世界獨立建國的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漢人中心的本土化運動如果只是急於造神造像——「×××是台灣××之父」，「台灣其實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台灣文化一直有其「自主性」，乃至於重新肯定「日本殖民主義其實比國民黨對台灣更有貢獻」……——那麼都可能只是對殖民主義的反動，並沒有對長遠的文化去殖民運動奠下分析性的基礎，只是在效果上服務於政治的獨立建國運動。舉例來說，如果教會在當代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在原住民生活圈及原運），那麼相對於菲律賓在西班牙時期即種下天主教的力量，或許我們得回到荷蘭時期就已深植的基督教傳統。原住民文化及漢人文化與荷蘭基督教會互動中是否已經產生了不同的混合？原住民的文化想像在與早期漢人的碰撞中又產生了什麼變化？其間不同群體自我認同是否已經在殖民／被殖民的關係中進行？漢人主體性的建構（constitution）在荷據時期與明鄭、滿清乃至於日據至今這整條軸線是否可以清楚的割出？在這些問題下我們很可能發現台灣文學之父是原住民口述神話的集體創作，而不是漢人書寫傳統下所定義的文學。問題不在於誰是父誰是母，而是要仔細釐清殖民主義史中文化想像構造的轉變，打破殖民認同的複製，才能走向後殖民具有進步性的文化想像。或許在重溯的基礎上，才能連結到台灣在日據以降所逐漸形成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因此，台灣當代文化想像的構造是極爲混雜的，其中主導性力量

包括了四九年以後國民黨所企圖腰斬不成的日據殖民文化與三個世紀深根閩南、客家文化的互動產物；國民黨從四九年至八〇年代中期所塑造的保守中國文化，以及同時期引進的美式意識形態；七〇年代後期文化工業逐漸形成、商品消費社會浮現，深化美日、乃至於香港商品文化的影響（預計在未來將透過文化消費與中國大陸商品市場加速互動，鄧麗君的先頭部隊，逐漸會擴張至各個場域）。這些多元壓縮的因子已經展現在台灣所獨創、已開大量外銷的 KTV 文化上。

如前所述，去殖民的因子在殖民發生時就已經埋下。台灣史的運動過程中，具有相當豐富「反殖民」或是抵抗殖民 (anti-colonial) 的文化資源，從 1635 年麻豆事件的原住民反荷運動起至今不斷；然而有意識的「去殖民」運動，特別是反思文化層次上處理殖民認同問題，却因高壓統治而沒有展開的歷史條件，直到解散前後逐漸浮現的社會運動，以多元主體的形式出現（勞工、女性、原住民、環保、一直到九〇年代以後的同志運動），以及本土化運動的擴散。黨外政治反對運動在當時確實替去殖民運動開創了不少生存空間，但是在以選舉為主軸的運作方式快速地被吸入主流政治體制，重演第三世界反殖民獨立建國運動的問題：在社會文化去殖民運動尚未展開時，却將所有能量推向新國族打造、新國家機器再造的主軸上；在與國民黨政權角力時迫使國家機器開始廣範收編既存的力量。文建會的社區命運共同體運動，以地方文化中心為據點，企圖與文化本土化運動結合，將原先具有去殖民色彩的本土化運動轉化成打造國族文化的先頭部隊；1994 年原住民文化會議則是收編原運去殖民力量的另一個指標。這些原本可以展開的文化去殖民空間，都在快速的為政治獨立建國運動所吞噬無法有自主性的深化，文化、學術都被吸到以統獨為後設敘述主軸的磁場中。

統獨問題所扣連的族群差異及省籍情結可以說是殖民主義的延續及反動，不是台灣所特有的現象。其中不僅參雜了前面提到的「文明主義 v.s. 小主體情結」，不能化約到簡單國族—國家認同的層次解解，

只是政治力量將其所暗示的慾望徵召至政治的場域之中；另外，它反射的是殖民主義導向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下，國族—國家在精神分析層次上所處的核心位置：作為對殖民主義的反動，第三世界國族—國家一方面要在「外」在的新殖民結構中自我呈現它的一致性（unity），另一方面要對「內」重新界定「自我」——誰是台灣人？誰是斯里蘭卡人？——也就在政治作用者所佔有的舞台上動員了族群差異來自自我鞏固（選票）地盤。這正是「族群」概念在戰後逐漸突起的部份解釋。再次引用 Tambiah 對斯里蘭卡的分析作為參考：「辛哈歷斯人與塔米爾人之間今天緊張衝突的形式是最近的產物——其實真的是廿世紀的現象。在過去三十年間，我們看到它所呈現的趨勢逐漸是以前不存在的“族群”動員與兩極化。這些分化來自於當代“國族主義者”的想法與爭執、國族打造，以及為了贏得選舉，而不完全是更早的關切及過程」（1986:7）。斯里蘭卡是極具典範性的實例，讓我們看到了殖民者「離去」時所帶來族群大火併的後遺症及「內部」殖民的粉墨登場其實是殖民主義的複製與再生產。沒有去殖民反思的介入，惡性循環會不斷的發生。在這個意義下，多元主體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及基進批判學術之間的互動是切開「族群—國族」所壟斷社會空間的主要去殖民運動能量之所在。獨立，統一，都是國家機器中心主義慾望投射的焦點，具有自主性的主體群仍然得面對權力集團所佔有結構性的霸權位置；也只有繼續深化去殖民力量的積累才能避免在現在及未來的宰制勢力所吞掉。

6. 「去殖民」

在以上的思辯過程中，本文企圖將文化研究再定位為去殖民反霸權方案的一部份。文化想像的去殖民是「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所瞄準的場域；在時間、空間去中心化後，將殖民問題再中心化（re-centering），亦即將宰制性權力關係問題擺在其問題意識之核心。它所暗示的文化政治是在分析層次上超越國族主義的認識論，以地理空

間置換國族—國家為分析單位；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在亞洲）的研究，不僅在回歸歷史，解構殖民的文化想像及殖民認同，也是在以「批判性混合主義」為倫理學原則上，介入出頭天情結所帶來的下一波（次）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慾望。

相對於處於核心地區學術帝國文化研究所提出的後殖民問題，將殖民主義視為過去的遺跡（legacy），去殖民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則認為1)在結構的層次上，新殖民主義是殖民主義的延伸，2)殖民主義在歷史的遭遇過程中所構造的文化想像正在積極的轉動著；因此，資本主義所發動的殖民主義仍然籠罩著變動中的世界。如果說，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是以去殖民為立足點，那麼「去殖民」在文化研究實踐上的理論與政治涵義到底是什麼？

對於去殖民的強調並不是在規範這是文化研究唯一的方向，也無意於提出一個新的「大敘事」來統攝所有的場域與理論範疇；之所以將焦點關切點擺在殖民認同、文化想像、精神分析的空間裡，即是在劃出特定的分析切面及理論上的接合點，或許能夠指出文化研究更具歷史性的「一個」方向。但是我同時要坦白的指出，我並不全然否定理論性「大敘事」存在的重要性，沒有「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現代性」、「社會」、「歷史」……就無法掌握文化形構中的支配性力量，更無法定位出這些力量交互接合的歷史軌跡。〔後結構主義以降所造成的理論焦慮症（反本質主義、反整體性、反二元論……），往往只是綁手綁腳、劃地自限，深怕隨時踩到地雷，而以模稜兩可、閃躲問題的方式進行分析，使得面對的問題無法釐清。〕然而，殖民主義確實提供了一個切入問題的方向，當代文化形構的現代性如果無法與殖民資本主義連結起來，就很難掌握像「現代化」、「發展」，甚至「國族—國家」的歷史動力，雖然這些現象的浮現無需化約地等同於殖民主義本身。

在前面的思辯過程中，「去殖民」在不同的歷史—空間脈絡中展現了多層次的意義。在帝國內部的批判性論述中，去殖民的意義在於對

帝國主義的去中心化反思，對於資本主義擴張性的批判；二次戰後，第三世界的去殖民運動被視為幾乎等同於獨立建國運動；在殖民地（如 Mannoni）去殖民的意義除了對殖民者的心態進行剖析，也迂涉到殖民機構的政權移轉策略；在 Fanon 的論述裡，我們看到了被殖民者自我的精神分析，對國族主義問題的質疑，也看到了「殖民」的多重結構絕不僅止於種族的界線；在 Nandy 的分析裡，更突顯出獨立建國之後，殖民主義與內部殖主主義的交叉作用，去殖民的焦點被擺在思想及文化乃至於文明之間對抗的層次上……如果我們追隨 Fanon 所開啓的問題，將「殖民」的概念擴大解釋，將結構性宰制的權力關係的改變都視為去殖民的對象，那麼去殖民將是永久的過程，不同的抗爭主體位置也會有不同的關切。但是對無論對於任何位置的主體而言，去殖民的意義都不可能在於「回歸」狹義的殖民時期之前，找回不受「污染」的過去，這不僅是在美化被殖民者過去的一切，也暗示著去殖民主體本身能夠超越殖民史的銘刻。去殖民的意義不在於找尋「純種」、「純粹」的主體性，而在於「祛除」殖民主義過程中所強加的保守因子及單一性、層次化的思考架構，在於「解除」在歷史遭遇、碰撞過程中所深植的反動情結²⁴。殖民主義對於封建專制主義的衝擊大概很少人會反對其中的正面意義；「自由」、「民主」在社會、文化想像中已經取得了難以祛除的位置，問題是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如何賦予它不同的意義，給予更為基進的生命力。這些價值觀是去殖民運動的文化資源，也是它的立足點，如果將這些資源掏空，用「李光耀式」地全部打入「西方的」牢籠來自我辯解內部殖民的正常性，那麼去殖民只能回歸到封建專制主義了。在全盤否定與全盤接受之間，存在著多重的可能性，去殖民就是在夾縫中揚棄僵硬的軸線，尋找新的連結點，開發新的空間。

總結來說，「去殖民」不僅指涉客觀存在的歷史運動，在主體，思

24. 丘延亮用「祛殖民」來置換「去殖民」的意義大概就在於此。

想、文化表現、社會機構，全球化的政經結構中操作；文化研究者作為去殖民運動環結中的作用者，其研究／論述的實踐本身要能成為一股去殖民力量，必須透過不斷的反思、檢討，不斷的自我去殖民。

參考書目

- 于治中，1995，〈主體性的建構與國族的文化想像〉，《台灣社會研究》，18: 215-224。
- 王振寰，1995，〈由南向政策，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帝國主義、資本國際化、或不知名的新現象——兼論對勞工的影響〉，《台灣社會研究》，18: 225-230。
-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20: 17-56。
- 王曉波，1995，〈台灣本土運動的異化——談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海峽評論》，53: 55-59。
- 江士林，1995，〈自然化的支配——關於國族化建制的歷史取向〉，《台灣社會研究》七週年會議。
- 李丁讚，1996，〈邊緣帝國〉，《台灣社會研究》，21: 141-170。
- 呂正惠，1995，〈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研究的回顧〉，《台灣社會研究》七週年學術研討會。
- 邱貴芬，1995，〈是後殖民，不是後現代——再談台灣身份／認同政治〉，《中外文學》，23 (11: 141-147)。
- 丘延亮，1995a，〈工害輸出、一「國」左派與民主否思：一個國際—歷史的「台灣次帝國」對話〉，《台灣社會研究》，18: 231-243。
- ，1995b，〈次帝國主義與次東方主義〉，《台灣社會研究》七週年會議。
- 夏鑄九，1995，〈全球經濟中的台灣城市與社會〉，《台灣社會研究》，20: 57-102。
- 陳光興，1994，〈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台灣社會研究》，17: 149-222。
- 陳芳明，1995，〈殖民歷史與台灣文學研究——讀陳昭英〈論台灣的本土化

- 運動》，《中外文學》，23（12: 110-119）。
- 陳昭瑛，1995，〈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23（9: 6-43）。
- ，1995，〈追尋「台灣人」的定義〉，《中外文學》，23（11: 136-140）。
- 陳映真，1995，〈台獨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海峽評論》，52: 30-38。
- 張國慶，1995，〈追尋「台灣意識」的定位：透視〈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之迷思〉，《中外文學》，23（10: 127-133）。
- 廖朝陽，1995a，〈中國人的悲情：回應陳昭瑛並論文化建構與民族認同〉，《中外文學》，23（10: 102-126）。
- ，1995b，〈再談空白主體〉，《中外文學》，23（12: 105-109）。
- 趙剛，1996，〈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21：1-72。
- 鄭文良，1995，〈想像「破國家」〉，《台灣社會研究》，18: 244-256。
- 瞿宛文，1995，〈經濟帝國之神話〉，《台灣社會研究》，18: 257-263。
- Altbach, Philip G. (1987), *The Knowledge Contex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Albe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min, Samir (1990),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Zed Books.
- (1992), *Empire of Chaos*, NY: Monthly Review.
- Arrighi, Giovanni (1978),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The Limits of Hobson's Paradigm*, London: New Left Book.
- Berry, Chris (1994), *A Bit on the Side: East-West Topographies of Desire*, Sydney: EM Press.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iersteker, Thomas J. (1987), *Multinationals, the State and Control of the Nigerian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ird, Jon, et al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Blaut, James M. (1992), *1492: The Debate on Colonialism, Eur-*

- ocentrism and History*, NJ: African World Press.
-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Y: Guilford.
- Blusse, Leonard (1995), "Retribution and Remor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 in Early Colonial Formosa," in Gyan Prakash (ed.), *After Colonialism: Imperial Histories and Postcolonial Displace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ehmer, Elleke (1995),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ngie, Chris (1991), *Exotic Memories: Literature, Colonialism, and the Fin de Siecle*, Stanford U Press.
- Brailey, Nigel (1994), "Thailand, Japanese Pan-Asianism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 in Saki Dokrill (ed.), *From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41-45*, London: Macmillan.
- Breckenridge, Carol A. and Peter van der Veer (eds.) (1993),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abral, Amilcar (1979),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NY: Monthly Review.
- Carland, John M. (1985),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Nigeria, 1989-191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Césaire, Aimé,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Chakrabarty, Dipesh (1992),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 *Representations* 37: 1-26.
- Chaliand, Gerard (1977),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Myth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Viking Press.
- (1989), *Minority Peoples in the age of Nation State*, London: Pluto.



- Chao, Kang (1995), "Politics of Categorization: Gendre, Class, Ethnicity, Status, Nation, Generation, and the Patriarchal Narration in an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 Taiw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hatterjee, Partha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 Chen, Kuan-Hsing (1994), "The Positioning position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Loc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3): 680-710.
- (1995a), "Ethnicities on Tri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Review: Cultural Studies and New Writings* 1(1).
- (1995b), "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era: the (Super) 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10(1).
- Chien, Edward (1986). *Chiao-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s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ing, Leo (1995), "The Disavowal and the Obsessional: Colonial Discourse East and Wes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ho, Hae-joang (1995), "Constructing and Deconstructing 'Koreanness' in the 1990s South Kor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howdhury, Anis, and Islam, Iyanatul (1993), *The Newly Industrialising Economies of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 Chua, Beng-Huat (1995), "Culture, Multiraci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paper presented at Trajectories II: A New Internationalist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 Constantino, Renato (1988), *Nationalism and Liberatio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Karrel, Inc.
- (1990), *The Philippines: The Continuing Past*.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The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

- (1992), *The Philippines: A Past Revisited Pre-Spanish-1941* (13th printing), Quezon City: The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
- Curthoys, Ann and Muecke, Stephen (1993), "Australia, for Example," in Wayne Hudson and David Carter (eds.), *The Republicanism Debate*, Kensington: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 David, Kumar and Kadirgamar, Santasilan (eds.) (1989), *Ethnicity: Identity, Conflict, Crisis*, Hong Kong: Arena Press.
- Davies, Ioan (1995), *Cultural Studies and Beyond: Fragments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 Deleuze, Gilles, and Guattari, Felix (1987),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A Thousand Plateau*, 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
- Dobbs-Higginson, Michael S. (1993), *Asia-Pacific: Its Role in the New World Disorder*, Australia: William Heinemann.
- Donaldson, Laura E. (1992), *Decolonizing Feminisms: Race, Gender, and Empire-Building*,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Du Bois, W.E.B. (1933/1989),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Y: Bantam Books.
- Duiker, William J. (1976),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sebebe, P. Olisanwuche (1994), *Pan-Africanism: The Idea and Movement, 1776-1991*, Wash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Ewen, Alexander (Ed.) (1994), *Voice of Indigenous Peoples: Native People Address the United Nations*, Santa Fe, New Mexico: Clear Light Publishers.
- Fanon, Frantz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 Feminist Review* (1993), "Nationalism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No. 44.
- Fieldhouse, D.K. (1982),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 Frei, Henry P. (1991), *Japan's Southward Advance and Australia;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World War II*,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 Fuss, Diana (1994), "Interior Colonies: Frantz Fan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 *Diacritics* 24 (2-3): 20-42.
- Gates, Henry Louis, J. (1991), "Critical Fanonism," *Critical Inquiry* 17(3): 457-70.
- Gauhar, Altaf (1987), "Asia: the Experience of the Subcontinent," in Bruno Kreisky and Humayun Gauhar (eds.), *Decolonisation and After: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Southern Publications, pp. 51-61.
- Gilroy, Paul (1993), *Small Acts: Thoughts on the Politics of Black Cultures*, London: Serpent's Tail.
- (1994), "Black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view with Paul Gilroy by Timmy Lott," *Found Object* 4: 46-81.
- Gladwin, Thomas and Saidin, Ahmad (1980), *Slaves of the White Myth: The Psychology of Neocolonialis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 Godlewska, Anne and Smith, Neil (eds.) (1994), *Geography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 Gomes, Alberto (1994), *Modernity and Identity: Asian Illustrations*, Australia: La Trobe University Press.
- Goonatilake, Susantha (1982), *Crippled Minds: An Exploration into Colonial Culture*, New Delhi: Vikas.
- Gregory, Derek (1994),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Hage, Ghassan (1993), "Republicanism, Multiculturalism, Zoology," *Communal/Plural* (2): 113-138.
- Hall, Stuart (1991),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and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 Anthony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London: Macmillan, pp. 19-39, 41-68.
-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T.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Polity Press, pp. 274-316.
- (1995), "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 *New Left Review* 209: 3-14.
- (1996a),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 (1996b),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 Harlow, Barbara (1987), *Resistance L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 Heryanto, Ariel (1994), "Chinese Indonesia in Public Culture: Ethnic Identities and Eras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dentities, Ethnicities and Nationalities: Asian and Pacific Context,"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 Hobson, J.A. (1965), *Imp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2).
- Hooson, David (ed.) (1994),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Hoston, Germaine A. (1994), *The State,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and Jap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ulme, Peter (1992), *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 London: Routledge.
- Huntchinson, John and Smith, Anthony D. (eds.) (1994),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yawardena, Kumari (1995), *The White Woman's Other Burden*:

- Western Women and South Asia during British Rule*, NY: Routledge.
- Johnston, Hank and Klandermans, Bert (eds.), (1995),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aplan, Amy and Peace, Donald(eds.) (1993),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iernan, V.G. (1980), *America: The New Imperialism—From White Settlement to World Hegemony*, London: Zed.
- King, Anthony D. (1991),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Binghamton: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t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Kreisky, Bruno, and Gauhar, Humayun (eds.) (1987), *Decolonisation and After: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South Publications.
- Lamming, George (1960, 1992), *The Pleasure of Exile*,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ress.
- Li, Shang-Jen(1995), "British Imperial Medicin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the Early Career of Patrick Manson", unpublished MA thesis, Imperial College(UK).
- Magdoff, Harry (1978), *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rinoni, O (1990), *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arogaran, Chelvadurai (1987), *Ethnic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Sri Lan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aruyama, Masao (1963),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Oxford U Press.
- McClintock, Anne (1994),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

- 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London: Routledge.
- Memmi, Albert (1968), *Dominated Man: Notes towards a Portrait*,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5),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4), *Dependence: A sketch for a Portrait of the Dependent*, Boston: Beacon Press.
- Morley, David and Chen, Kuan-Hsing (1996), "Introduction,"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 Morris-Jones, W. and Fischer, Georges (eds.) (1980), *Decolonisation and After: the British and French Experiences*, London: F. Cass.
- Muecke, Stephen (1992), *Textual Spaces: Aboriginal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Kensington: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 Nabudere, Dan (197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Its Theoretical and Polemical Treatment from Mercantilist to Multilateral Imperialism*, London: Zed Press.
- Nandy, Ashis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 Delhi: Oxford U Press.
- New Formations* (1993), "Perversity", no. 19.
- Ngugi, WA Thiong'o (1986),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Nairobi: Heinemann Kenya.
- Offiong, Daniel A. (1982), *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y: Obstacles to Africa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O'Leavy, Brendar (1989),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London: Blackwell.
- Omvedt, Gail (1993), *Reinventing Revolution: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India*, NY: M.E. Sharpe.

- O'Reagan, Tom (ed.). (1994),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Continuum 8(2).
- Peet, Richard (1985),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Karl Wittfogel," *Antipode* 17(1): 3-20.
- (1991), *Global Capitalism: Theori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Phadnis, Urmila (1990),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Sage.
- Rafael, Vicent L. (ed.) (1995), *Discrepant Histories: Translocal Essays on Filipino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aghavan, Chakravarthi (1990), *Recolonization: GATT,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Third World*, Penang, Malaysia: Third World Network and London: Zed Books.
- Russell, Penny (1994), *'A Wish of Distinction': Colonial Gentility and Feminin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angari, Kumkum and Vaid, Sudesh (1990),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Indian Colonial History*,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ato, Shigeru (1994), *War, Nationalism and Peasants: Java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Sydney: Allen & Unwin.
- Seow, Francis T. (1994), *To Catch a Tartar: an Dissident in Lee Kuan Yew's Prison*, Yale: Cetn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 Smith, Neil (1990),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oja, Edward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y: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oja, Edward W., and Hadjimichalis, Costis (1985), "Between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and Spatial Fetishism: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patial Analysis," *Antipode* 17(2/

- 3): 59-67.
- Sprinker, Michael, et. al. (eds.) (1995), *Late Imperial Culture*, London: Verso.
- Spurr, David (1993),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ke U Press.
- Tambiah, S.J. (1986),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rainor, Luke (1994),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 Manipulation,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 Wei-ming (1991),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Global Consciousness and Local Awareness," *IHI Bulletin: A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11(1): 1-5.
- Vergés, Francoise (1995), *Monsters and Revolutionaries: Colonial Family Romance and Metiss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Wittfogel, Karl A. (1985), "Geopolitics,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m," (trans.), G.L. Ulmen, *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 17(1): 21-7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vol. 3, no. s 1, 4, 5, 1929.]
- Willemsen, Paul (1995), "Regimes of Subjectivity and Loo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rajectories II: A New Internationalist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Taipei.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seley, Peter (1964), *The Third World*,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 (1964),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 Young, Robert (1995),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